

知识青年自学丛书

10
600327-36

秦始皇评传

陕西师范大学写作组

何清谷 执笔



陕西人民出版社

秦始皇评传

陕西师范大学写作组

何清谷 执笔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秦始皇事略·····	(1)
第二章	战国晚期历史发展的趋势·····	(6)
第三章	秦始皇的历史贡献·····	(29)
一、	清除吕不韦、嫪毐复辟集团，重用 法家·····	(29)
二、	结束诸侯割据混战局面，第一次实 现了统一中国·····	(49)
三、	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 行郡县制·····	(60)
四、	摧毁奴隶制复辟的经济基础，把封 建生产关系推广到全国·····	(70)
五、	统一与改革文字、货币、度量衡和 水陆交通道路·····	(77)
六、	“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实行专政·····	(91)
第四章	正确评价秦始皇·····	(103)
附：	秦历史年表·····	(127)

第一章 秦始皇事略

秦始皇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他尊法反儒，厚今薄古，坚持革新，反对倒退，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在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秦始皇，姓嬴，名政，是秦昭王的曾孙，秦庄襄王的儿子。他公元前二五九年正月出生在赵国的京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西南）；公元前二四七年，十三岁登上秦王的王位；公元前二三八年，二十二岁开始亲自执政。当时是战国晚期，封建制正在代替奴隶制。反对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铲除分裂割据的诸侯王国，统一中国，成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秦始皇开始执政的时候，秦国正是吕不韦、嫪毐（音涝矮 làoǎi）奴隶主贵族集团复辟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他为了捍卫法家的政治路线，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从公元前二三八年至前二三五年，经过四年的坚

决斗争，彻底打倒了吕、嫪反动集团，粉碎了奴隶主贵族篡权复辟的阴谋，重用李斯、尉繚等法家人才。这是一次法家改革路线的重大胜利。

秦始皇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从公元前二三〇年灭韩国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国告终，经过十年的奋战，终于消灭了六国，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统一中国后，他决定把原来“秦王”的称号改称为“皇帝”，并宣布应称他为“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的意思，表示由他所开创的封建帝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人们把他叫秦始皇。

秦始皇为了巩固国家的封建统一，根据法家路线实行政治改革。他击退了以王绾(音婉wǎn)为代表的儒家反动势力的进攻，决然废除了残存的奴隶主分封制，把由新兴地主阶级掌权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并改革了中央的官制，彻底结束了诸侯割据混战的战国时代，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

秦始皇利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大力推行法家的经济改革路线。统一以后，他下令把分散在各地的十二万户“富豪”，强迫迁到首都咸阳一带，以

削弱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力量，防止他们进行复辟活动；他还采取免除徭役或赏赐爵位的办法，把十四万户人家迁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去开垦荒地，有力地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公元前二一六年，他颁布了“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以法令形式把封建土地私有制推广到全国；他还推行了重农抑商政策，严厉打击了奴隶主商人。他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消灭了奴隶制复辟的经济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巩固了封建生产关系。

秦始皇为了消除奴隶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分裂因素，加强封建国家的统一，从公元前二二一年开始，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和水陆道路的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秦始皇为了打退“以古非今”的反动儒生的猖狂进攻，公元前二一三年，他下令焚了宣传开倒车的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次年，他又坑了进行复辟活动的四百六十个犯法的儒生。“焚书”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的革命专政，“坑儒”是对反动分子的镇压。“焚书坑儒”是为了用法家思想来统一思想，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

秦始皇为了地主阶级的事业，每天都要坚持看一

百二十斤重的竹木简奏章，不看完不休息。他为了向奴隶主复辟势力示威，在统一以后的十一年中，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〇年七月，在最后一次巡游的中途，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平乡县东北）。他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秦始皇是一位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他“上小尧舜，下邈三王”^①，蔑视既往，正视现实，坚持革新，反对复古。他认为“古之五帝三王”，都是“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奴隶制的夏商周三代是不足法的，而他所进行的事业却是“上古以来未尝有”^②。秦始皇以法家的革新思想为武器，顶逆风，战恶浪，打退了代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儒家复古派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的一生，是与奴隶主复辟势力顽强战斗的一生，是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变法的一生。

但是，两千多年来，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尊孔派和反动保守势力，都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疯狂咒骂秦始皇。叛徒、卖国贼林彪步历代反动派的后

①刘向：《战国策·序》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尘，不止一次地借咒骂秦始皇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今天，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评价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是史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严肃的战斗任务。

通过评价秦始皇，科学地分析两千多年前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敌对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于我们认识今天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有现实意义的；对于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觉悟，也是有帮助的。

第二章 战国晚期历史发展的趋势

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统一事业，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革新措施，都不能单纯归结为偶然的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这一场历史大变革是从铁器的使用开始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冶铁技术发展起来。在冶铁作坊里，奴隶们制造出铁锄、铁斧、铁犁头等工具。用牛耕田的方法也发明了。铁器和牛耕代替了原来的木耜(音伺sì)和石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提高了改造自然和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劳动人民用铁工具，开垦了许多荒地，修建了不少灌溉渠。腐朽没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依靠强迫奴隶劳动的“井田”，由于奴隶怠工、逃亡，“田在草间”，“维莠骄骄”，荒芜不堪。与之相对立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私田)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在井田以外开垦荒地的私田所

有者，鉴于井田制的剥削形式无利可图，便对耕种土地的人采取了封建的租佃剥削形式。在这种新的剥削形式下，拥有大量私田的人就是地主，种地交租的人就是佃农。于是，在奴隶社会内部便产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奴隶们不堪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压迫，纷纷奋起反抗，或逃亡山林，或投入“私家”（新兴地主阶级），或举行哗变^①，或揭竿而起，发动起义。奴隶领袖柳下跖（音执 zhí），领导了一支庞大的起义队伍，转战各地，“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扫荡着大小奴隶主贵族。他们所到之处，奴隶主贵族望风而逃，“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②，给各国奴隶主统治者以极沉重的打击。与奴隶的革命斗争相呼应，平民的反抗运动也风起云涌，遍及各地。奴隶、平民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弑君（杀死国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③ 奴隶制秩序被打得落花流水。从而打

①哗变：春秋时代叫“民溃”，即奴隶集体逃亡或暴动。

②《庄子·盗跖篇》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

破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这时，新兴地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利用人民革命的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如田氏取齐，三家分晋等等。我国历史从此开始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飞跃转变。

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是积极拥护和参加变革，还是竭力抗拒和反对变革，这是区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当时，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变革，他们砸碎奴隶制的枷锁，冲决统治者布下的各种罗网，奋不顾身地为摧毁旧制度而斗争到底。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力军。当时，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也以生气勃勃的姿态，要求变革，并乘机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些力量都是当时的革命派。与此相反，周王室和各国的奴隶主贵族，则坚决反对变革，竭力维护分崩离析的奴隶制，镇压奴隶起义，抗拒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这就是当时的反革命派。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阶级斗争的风暴倾覆了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殊死斗争。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和代表新兴

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之间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也愈加激烈了。这种斗争表现为“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斗争，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法古”和“反古”、“师古”和“师今”、“法先王”和“法后王”的斗争。儒家要“法古”、“师古”、“法先王”，就是要全盘恢复殷周奴隶制度，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一条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反动政治路线。法家要“反古”、“师今”、“法后王”，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新兴的封建制度，促进历史前进，这是一条坚持革新、反对复辟的政治路线。儒家和法家的大论战，是当时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战国前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为了和奴隶主贵族争夺统治地位，都在不同程度上根据法家政治路线进行封建的社会改革，掀起了一个变法运动。当时的变法，实质上就是变奴隶制为封建制的社会革命。在各国的变法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较为全面和彻底，可以说是各国社会改革的总结。通过商鞅变法，法家的政治路线在秦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函谷关以西的秦国，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诸侯国。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内部新

旧势力的斗争很尖锐，关东诸侯^①把它当落后的戎族看待，新兴的魏国不断加兵于秦，把它挤在西方一个角落里。公元前三六一年，秦始皇的前六代祖先秦孝公即位。秦孝公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痛感到“诸侯卑（瞧不起）秦，丑莫大焉。”^②急切地希望“变法以治”^③。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起来，就请他做大官。”商鞅^④闻讯后从魏国跑到秦国，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商鞅对法家李悝（音亏kuī）很崇拜，是个“好刑名之学”^⑤的法家。他曾在魏相公叔痤（音磋cuó）的手下作办事人员，公叔痤把他推荐给魏惠王，由于他的政治主张激进，魏惠王拒绝任用。商鞅入秦后，用法家的变法理论说服了秦孝公，在秦国实行了著名的商鞅变法，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改革家。

商鞅从公元前三五九年至前三五〇年，颁布了一

①关东诸侯：指函谷关以东的齐、楚、燕、韩、赵、魏等诸侯国。

又因为这些诸侯国在华山以东，所以也称山东诸侯。

②《史记·秦本纪》

③《商君书·更法》

④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因变法有功，秦孝公封他为商君，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

⑤《史记·商君列传》

系列破旧立新的变法措施。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一）以法律形式宣布“废井田”，“开阡陌”，招民垦荒，用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从而摧毁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二）规定旧宗室贵族没有现实军功的，不许再列入宗室的名册。这就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①，否定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

（三）提倡“耕战”政策。规定有“军功”的可以“受上爵”；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获得较多粮食的可以免除各种徭役；鼓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田与胜敌”^②的途径改变社会地位。

（四）废除分封制，在秦全境设三十一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强了中央集权。

（五）焚毁儒家反动经典《诗》、《书》，禁止儒生游说，彰明法令，用法家学说统一思想。

商鞅变法是法家理论的一次比较全面而成功的实践，是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正如李斯所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

①世卿世禄制度：奴隶主各个等级之间的上下关系都是固定的，是父子相传，世袭的。

②《通典·选举（一）》

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①。从此，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当时最先进的强国。

秦国封建的社会改革为什么能比关东六国彻底呢？

这与秦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秦国统治的关中地区，经过西周末年的战乱，井田制的耕地只占十分之二，荒地要占十分之八，奴隶制经济很落后。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曾西到潼乡（陕西华阴），有的记载说这次起义就是在秦国发生的^②。可以肯定，秦国的奴隶大量的参加了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致使秦奴隶主政权一直摇摇欲坠。秦人的风俗、文化受西戎的影响很大，“孔子西行不到秦”^③，儒家当时在秦国影响比较微弱。总之，秦国是当时奴隶制的薄弱环节，封建制度比较容易冲破这个薄弱环节而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在奴隶反抗斗争的推动下，秦国内部封建生产关系也发展起来，公元前四〇八年，秦行与鲁国“初税亩”一样的“初租禾”，从法律上承认了已经出现的地主土地私有制。由于广大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的黑暗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汉书·贾谊传》注，“跖，秦大盗也。”

③ 韩愈：《石鼓歌》

统治（所谓“百姓郁怨非上”），公元前三八五年，士兵违抗奴隶主贵族的命令在边境倒戈，迎接逃亡在魏国的秦公子连回国夺取政权，这就是秦献公^①。秦献公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掌权后实行废止奴隶主杀人殉葬的制度，制定户籍制度，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为他的继承人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作了准备。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路线问题。由于商鞅总结了关东六国变法中的正反两面经验，制定了一条坚定彻底的法家政治路线，排除了儒家反动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多次打退了奴隶主贵族的猖狂进攻，才赢得了变法的胜利。

前面说儒家思想在秦国影响微弱，那是与关东六国比较而言，实际上哪里有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存在，哪里就有儒家思想活跃的土壤。秦大夫甘龙、杜挚之流，就是秦孝公周围的儒家代表。他们趁秦孝公召集群臣廷议军国大事的机会，对商鞅群起而攻之，挑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甘龙说：“聪明人都是不变法来治理国家的，那可以不劳而成功，官吏都很熟悉，百姓也能相安。现在如果变法、更礼，不遵循秦

^① 《吕氏春秋·当赏篇》

国的旧制度，我恐怕天下人议论君上。”商鞅说：

“甘龙说的是庸人的见解。一般人总是安于习俗，而儒生们又是只相信自己的见闻。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却都成就了王业；五霸的法度并不一致，却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人创立新法，愚者受它的制约；贤者变更礼法，不肖者抱残守缺。和拘守旧礼的人，不值得谈论变法的事。请君上不要怀疑。”杜挚说：

“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法，向古人学习不会出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乱子。”商鞅说：“礼法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制定的，命令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是适宜的。治国的办法不只一种，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学古人的。反对古代制度不应该非难，遵循旧礼不值得赞扬。”^①这场围绕变法与反变法，“复古”与“法古”的激烈辩论，就是法家政治路线与儒家政治路线的斗争。由于秦孝公的坚决支持，商鞅击退了奴隶主贵族的进攻，为变法开辟了道路。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受到奴隶主贵族势力的顽抗。商鞅迎着阶级斗争风浪，坚定地执行了法家的政治路线，主动积极地打击破坏变法的奴隶主贵族势力。秦国京都及国内各地的奴隶主

^①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更法篇》

贵族成群结伙反对变法，“初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商鞅在群众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在咸阳附近的渭河边上杀了七百多个旧贵族；还把恶意攻击变法的“乱化之民”，全部驱逐到边疆去。变法的主要阻力是秦国的宗室贵戚，所谓“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①，“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②，他们纷纷纠集在公子虔（音钱qián）的旗帜下，唆使太子“犯法”，竭力阻挠变法的实行。商鞅面对着这种“法之不行，自于贵戚”^③的局面，在秦孝公支持下，对宗族奴隶主集团进行了沉重打击。他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办了罪：割了公子虔的鼻子，给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头子祝懽（音欢 huān）。于是新法大行，“秦民大悦”，“乡邑大治”^④。

随着变法的深入，奴隶主贵族用儒家的《诗》、《书》作思想武器，从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断进行反扑。在商鞅相秦的第十年，有个反动儒生叫赵良的，在奴隶主贵族的授意下，跑去指责商鞅。他引用《尚书》上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咒骂商鞅。意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盐铁论·非鞅》

③《史记·秦本纪》

④《史记·商君列传》

思是：“依靠德行必然兴旺，依靠暴力必然灭亡。”说商鞅用革命暴力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违背了儒家的诗书，不得好死，还威胁商鞅下台，去乡村种地，好让他们这伙奴隶主贵族搞复辟。商鞅毫不动摇，对儒家的反动思想展开了严正的批判。被孔丘吹得天花乱坠的“六艺”，商鞅却把它叫“六虱”。意思是：儒家的“六艺”就象人身上的六种虱子，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传染疾病，坏极了。商鞅反复强调“六虱”的危害，指出“无六虱，必强”，“有六虱，必弱”，“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等等^①。这表明商鞅明确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有腐蚀人心，破坏地主阶级法制，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作用。商鞅认为儒家盘踞私学，授徒讲学，奔走游说，是“贫国弱兵之教”^②，必须坚决禁止。因此，他下令烧毁奴隶主贵族借以进行复辟活动的儒家经典，禁止儒生奔走游说，招摇撞骗。这是商鞅变法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思想采取的强有力的专政措施，它严厉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是法家政治路线在秦国的巨大胜

①《商君书·靳令篇》

②《商君书·画策篇》

利。

历史在前进，但道路是曲折的。商鞅变法以后，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始终不甘心失败，一有机会便兴风作浪，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

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死去，其子惠文王继位，以公子虔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向以商鞅为首的法家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商鞅遭到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报复，被“车裂”而死。从表面上看，商鞅的下场和楚国的变法者吴起是一样的，但吴起变法随着吴起被射杀而失败，商鞅变法却不因商鞅被车裂而夭折。这是由于吴起变法不仅深度差，时间也短，前后不到两年，变法成果没有一段巩固的时间，奴隶主贵族一卷土重来就达到了复辟的目的。商鞅变法却在秦国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二十一年，“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①。变法成果在社会上扎下了根，新兴的封建制度在秦国奠定了牢固的根基。所以，奴隶主贵族在反扑时，不敢公开打出反对商鞅变法的旗子，而是诬告商鞅“谋反”。虽然他们达到了阶级报复的目的，却不能改变秦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秦法未败也”^②，这话说得不错。商鞅死后，

①《战国策·秦策一》

②《韩非子·定法篇》

奴隶主贵族没有能够掌握秦国的最高权力，秦惠文王任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商鞅制定的法家政策。张仪是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活动家，他多次拆散了关东六国的“合纵”^①抗秦，使秦国的“连横”^②策略取得重大胜利。

继秦惠文王、秦武王之后，是秦昭王(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秦昭王在位期间，前四十年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听政。在宣太后支持下，形成以穰(音瓢ráng)侯魏冉为首，包括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在内的奴隶主贵族复辟集团。这个集团在经济上“私家富重于王室”，在政治上“威振秦国”^③，飞扬跋扈，作福作威。“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专断)无讳(畏)，高陵君进退不请”^④，把秦昭王一度完全变成了傀儡。他们极力把秦国的封建统一战争转变成给他们掠夺世袭封地的战争。在此期间，秦军得了韩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宛就划成

①合纵：关东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面的秦国，造成南北联盟的局面。从地理上看，南北合成一条直线，所以叫“合纵”。

②连横：秦国拆散“合纵”的策略。就是使关东诸侯跟秦国亲善，造成东西联盟的局面。从地理上看，东西连成一条横线，所以叫“连横”。

③《史记·穰侯列传》

④《史记·范雎列传》

泾阳君的封地；秦军得了魏国的邓（今河南邓县），邓就划为高陵君的封地；秦军从齐国手里夺来著名的商业城市陶（今山东定陶），魏冉就把陶划为他的封地。魏冉为了扩大他的以陶为中心的奴隶主独立王国，公元前二七一年，强令秦军越过韩魏，远攻齐国的刚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魏冉竭力迫害法家，把来自韩、赵、魏等国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① 这充分暴露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本性。

在秦国封建政权“危如累卵”的严重时刻，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雎（音虽 suī）从魏国来到秦国。他避过穰侯魏冉的搜查，进见秦昭王。他向秦昭王表示，愿继承商鞅的事业，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为秦国的地主阶级事业作出贡献；他揭露了秦国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的种种罪恶；他批判了魏冉为扩大自己封地而实行的“远攻近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范雎的主张博得秦昭王的赞同，于是“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②，秦昭王任用范雎后，在对外战争中连续取得新的胜利，从而加强了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秦

①《史记·范雎列传》

②《史记·范雎列传》

昭王接受了范雎的“强公室，杜私门”^①的建议，公元前二六六年，把魏冉、高陵君、泾阳君、华阳君等一小撮奴隶主贵族驱逐到关外，拜范雎为相，重新夺回了地主阶级失去的部分权力。在范雎执政的十六年中（公元前266—前251年），法家政治路线在秦国取得新的胜利。在远交近攻方针指导下，秦展开了对韩、赵、魏三国的蚕食，公元前二六〇年，在秦赵长平（今山西高平北）之战中，秦灭赵军四十五万，从根本上改变了秦与关东六国军事力量的对比，造成了秦灭六国的定局。

在这段时间，秦国的政局虽然有些反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仍然坚持着尊法反儒的传统，公开的儒生在秦国根本站不住脚。据说，孔丘的家乡有两个儒生，一个姓施的到楚国去游说受到了重用，另一个姓孟的看了眼红，他也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去向秦王游说。秦王大怒，说：“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以仁义治吾国，是亡国之道。”不仅没让他做官，还给他上了宫刑，搞成残废以后驱逐出境。他灰溜溜地回到家乡向人诉委屈，有人安慰他说：“得时者昌，失时者亡”，你把时间和对象选错了^②。这说明当时

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列子·说符篇》

秦国的君主是根本不接受儒家那一套的。范雎执政后，继续执行了商鞅以来对儒家坚决取缔的政策，大力宣传法家思想。荀子当时在秦国考察的结果，就发现秦国“无儒”。荀子曾问秦昭王为什么不用儒生，昭王说：“儒无益于人之国”^①。可见，儒家在秦国压根儿吃不开。

秦国与关东六国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执行的路线不同。战国时期的历史表明，那一国奉行法家的政治路线，那一国就走向强盛；反之，离开了法家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日益衰落。因为，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就能主动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继续发展新兴的封建制度；如果离开法家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放弃反对奴隶制复辟的阶级斗争，新兴地主阶级得到的政权就会丢掉，就会丧失封建改革成果，就会出现奴隶制的复辟。关东六国在商鞅变法前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根据法家路线实行过社会改革，但为什么都没有收到象商鞅变法那样的效果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关东六国都没有象商鞅变法那样比较坚决地摧毁奴隶主贵族势力。魏国的李悝变法，只实行了些发展生产镇压农民的措施，没有触动奴隶主贵族

^①《荀子·儒效篇》

的根本利益。韩国的申不害行法完全走了过场，“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奴隶主贵族用“故法”反对新法，造成严重的混乱^①。楚国的吴起变法，当时就遭到奴隶主贵族的反扑而失败。齐国地主阶级掌权较早，也有过一些改革，但田氏宗族势力一直很大。这些诸侯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封地及其他特权普遍被保留下来，构成一股庞大的保守复辟势力。二是关东六国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对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有力的冲击，甚至对各种敌对思想兼收并蓄，调和矛盾，结果给儒家思想的反攻开了方便之门。例如魏文侯，一面用法家大师李悝变法，一面又拜孔老二的学生卜子夏为师，他的后代魏安厘王还用“黄金束帛”聘请孔老二的七世孙儒生子顺担任魏相，大搞复古活动^②。赵烈侯在军事、财政方面实行法家的主张，在思想上却尊儒家，倡“仁义”，行“王道”^③。所以，在关东六国儒家长期居于“显学”地位。在商鞅变法时期，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在关东发动了对法家的围剿。他咒骂法家是“民贼”^④，要求严厉镇压；

①《韩非子·定法篇》

②《孔丛子·执节》

③《史记·赵世家》

④《孟子·告子下》

公开叫嚷“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①，即不准触犯奴隶主贵族利益。他到处受到奴隶主贵族的欢迎，“跟随的车辆几十，跟随的人几百，由这一国吃到那一国”^②，比孔老二周游列国还猖狂，这是奴隶制复辟势力疯狂挣扎的反映。孔孟的徒子徒孙利用诸侯割据局面，成帮结伙，奔走游说，摇唇鼓舌，招摇撞骗，极力鼓吹复古主义，掀起一阵阵的反对法家的逆流。由于关东六国反法尊儒的思想往往占上风，奴隶主贵族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招纳门客，结党营私，左右国君，疯狂进行篡权复辟活动。因而造成法制不定，内乱时起，政局逆转，一度实行法家政治带来的积极成果遭到严重破坏。秦国与关东六国相反，虽然也经历了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但基本上是一直沿着商鞅开辟的道路向前发展的。由于秦国长期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由军功起家的地主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排斥旧贵族，支持外来的地主阶级政治活动家做卿相，主持国政，因而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比较巩固，法令比较统一，国力蒸蒸日上。据亲自去秦国

①《孟子·离娄上》

②《孟子·滕文公下》

考察政治的荀子说：秦国的民俗纯朴，士大夫不结党营私，官吏奉公守法，官府办事的效率较高，是七国中政治最好的国家^①。法家大师韩非在把关东诸侯和秦国作比较时，就敏锐地揭示出两者执行的路线不同。他说：“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韩、赵、魏）也；不慕（仁义）而强者，秦也。”^②法家的计策“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同稀）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③韩非说出了问题的本质。秦国的富强，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执行了一条坚决反儒的法家路线。

秦国由于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因而促成了地主经济的繁荣。春秋战国时代牛耕本来首先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由于废除井田制和奖励耕织政策的推行，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秦国使用牛耕的普遍程度迅速后来居上，秦人以牛耕田，战士分给上等田地，曾引起赵国的恐慌^④。广泛招徕劳动力的政策，吸引韩、赵、魏三国人民成群结队地渡过天堑黄河，奔赴秦国开荒落户，使秦国境内原占土地面积十分之八的荒地迅速变

①《荀子·强国篇》

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③《韩非子·五蠹》

④《战国策·赵策一》

成良田。秦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发挥了组织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作用。在秦昭王时期，由蜀郡郡守李冰主持在今四川灌县兴修的都江堰，就是一项伟大的防洪灌溉工程。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问题，还建造了一百二十道渠堰，浇灌农田达一百万亩，使成都平原变成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秦始皇即位后，由水工郑国主持兴修的郑国渠，沟通了关中的泾水和洛水，从现在的泾阳西北贯穿三原、富平、蒲城等县，长达三百多里，灌溉农田四百多万亩，使原来地广人稀的关中，变成号称“沃壤千里”的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照司马迁的说法，关中的人口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量其财富要占十分之六^①。这一切证明，秦国的经济力量大大超过关东六国。

战国中期以来，各国都企图打败别国，以自己为基础实现统一。这个时期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每战兵力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战争不仅为了占领对方的土地，而且注重消灭有生力量，以便从根本上摧毁对方。但是，由于秦国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国库“积粟如丘山”^②，实行奖励军功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史记·张仪列传》

的政策，人民“勇于公战”。因而秦军装备精良，供给充足，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关东六国则由于政局逆转，奴隶、农民的反抗斗争十分激烈，从根本上摧毁或削弱了旧贵族的统治力量，勉强凑成的军队也没有战斗力。正如荀子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指魏国）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①秦军的战斗力当时是最强的。六国的军队在打仗时，贵族们在后面手执锋利的板斧斩杀临阵退却的士兵，但士兵一遇上秦军的“白刃”总是纷纷溃退；秦军却是一听冲锋号令，个个“犯白刃，蹈炉炭”，奋勇杀敌^②。从公元前三六一年秦孝公即位，中经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直到秦始皇公元前二三八年亲自执政，共历六代一百二十三年，关东六国一个一个败落下去，唯独秦国越战越强。在此期间秦消灭了六国一百五十多万军队，领土从今关中地区扩展到陕南、陕北、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几乎占全中国的一半，使秦国成为实现封建统一的强大堡垒。

远在公元前二五九年，秦始皇刚诞生的时候，子

①《荀子·议兵篇》

②《韩非子·初见秦》

顺在魏国学当年孔老二的样子，演了一阵复古倒退的恶作剧后垮台了，他怀着比其老祖宗孔老二更绝望的心情说：“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指当时的东西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矣！”这说明连新兴地主阶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秦灭六国已经成为定局，奴隶主的垂死挣扎已经“大势不可”了^①。

当秦始皇刚即位的时候，李斯就兴高采烈地向秦始皇上了《论统一书》。他指出：秦国已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六国实际上已经降到秦的郡县的地位了。凭借秦国的强大和秦王的才干，可以象扫除灶上灰尘一样，吞并诸侯，完成封建统一的大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②！这说明由秦国来统一中国，已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指日可待了。

总之，由于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剧烈的阶级斗争，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复搏斗，不断推动着历史前进。到战国晚期，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代是由诸

^①《资治通鉴》卷五，赧王56年。

^②《史记·李斯列传》

侯割据称雄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转变的时代，是在全国范围内摧毁奴隶制残余、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的时代，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复辟势力大决战的时代。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反对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结束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秦始皇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激流中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创造了秦始皇。秦始皇由于适应了封建制必然彻底代替奴隶制的发展趋势，才能“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 在历史上作出了叱咤风云的表演。

^①贾谊：《过秦论》

第三章 秦始皇的历史贡献

列宁指出：“历史上，取得统治地位的每一个阶级，都举出了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① 秦始皇不愧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杰出代表。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范雎的事业，坚定地执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在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生死搏斗中，在完成封建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战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才能，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清除吕不韦、嫪毐复辟集团，重用法家

法家政治路线在秦国的胜利，是在不断清除封建政权内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实现的。秦始皇执政后，采取的第一项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就是清除吕

^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331页。

不韦、嫪毐奴隶主复辟集团，使秦国沿着法家的道路继续前进。

吕不韦，原是卫国“家累千金”的大奴隶主商人。当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在赵国作人质的时候，吕不韦在赵都邯郸贩卖珠宝。他看到这个落难的秦公子，认定是一笔“奇货可居”的生意，于是就把商业上的投机手段用到政治上来。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秦孝文王的儿子，弟兄有二十几位，老大叫子傒，他大约是第十几，将来无论如何轮不到他继承王位。吕不韦结识了异人以后，表示愿拿出“千金”去秦国活动立异人为嫡子^①，以便将来夺取王位。异人跪下对吕不韦说：“要是能办到，我一定和你共分秦国”。吕不韦跑到咸阳，用贿赂打通了华阳夫人的门子。华阳夫人是秦孝文王的宠妃，原是楚国奴隶主贵族的女儿，她的姐姐和弟弟阳泉君也都仗着这种裙带关系在秦国享福，他们把持宫闱，声势煊赫，成为秦国宫廷中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这个贵族集团忧心秦孝文王死了，怕自己的权势保不住。吕不韦针对他们的切身利益进行游说，说异人多么孝顺，把华阳

^①嫡子：按封建宗法制度，正妻所生的儿子叫嫡子，有对其父财产权力的继承权。此时孝文王还是太子，叫安国君，没有即王位，故吕不韦只能为异人争立嫡子。

夫人当自己的亲娘，日夜思念等等，讨得了华阳夫人的喜欢。吕不韦帮助异人逃出邯郸回到咸阳，在去见华阳夫人时他叫异人换上楚国的服装，并给作了导演。异人见了华阳夫人装模作样地说：“儿子真是不孝，不能伺候母亲，直到今天才回来，请母亲宽容。”华阳夫人见他那装束挺奇怪地问：“你怎么穿楚国人的衣裳呀？”异人立刻禀告说：“我在邯郸天天想念母亲，特地做了这套衣裳穿。”华阳夫人高兴极了，说，“我是楚国人，你也喜欢这么打扮，真是我的儿子。从今天起，你就算是我亲生的，改名叫子楚吧！”子楚立刻向母亲磕头。华阳夫人缠住孝文王把子楚立为太子，不久孝文王死了，子楚继承王位，这就是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奉华阳夫人为太后，拜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原来的丞相蔡泽，惧怕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攻击而主动辞职。秦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就死了，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即位，吕不韦以丞相和“仲父”的身份辅政，俨然成了掌握秦国大权的“太上皇”。吕不韦的上台，固然是他阴谋诡计的成功，但关键还在于以华阳夫人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

从公元前二四九年到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始皇亲政之前，吕不韦实际控制着秦国的政权。在他执政期

间，极力推行儒家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破坏在秦国占统治地位的法家政治路线。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吕不韦要在秦国搞复辟，首先就从意识形态领域向法家进攻。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号称“四公子”，都是横行一时的奴隶主贵族。他们“名冠诸侯”①、“名高其主”②、“辅国持权”③，任所欲为。他们豢养着数以千计的食客，到处为非作歹，耀武扬威，里通外国，疯狂地进行奴隶制复辟活动。吕不韦对他们那样的大干眼红极了，自“羞不如”。他以“四公子”为榜样，大量招徕关东各国的儒生、术士入秦，门下养有食客三千人，让他们著书立说，大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最后由吕不韦主持编成一部《吕氏春秋》④。

《吕氏春秋》的出笼，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儒

① 《史记·信陵君列传》

② 《史记·孟尝君列传》

③ 《史记·春申君列传》

④ 《史记·吕不韦列传》

法论争的一个新动向。战国中期以来，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儒家思想的欺骗性越来越小。特别是秦国，自商鞅把儒家当虱子一样除掉以后，公开活动的儒生一直在秦国站不住脚。阴险狡猾的吕不韦，不敢在秦国公开亮出儒家的牌子，只好采取折衷主义的反革命手法，在“杂家”的幌子下贩卖儒家的黑货。《吕氏春秋》表面上搞东拼西凑，好象是诸子百家的大杂烩，所以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把它列为“杂家”。其实“杂”不过是摆下的迷惑阵，故意要把人们的思想闹乱，实际上，它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露骨的，即扬儒道，非名、法。这是一部鼓吹儒家的政治路线，攻击法家的路线和政策的反动著作。司马迁说：这部书是“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①。可见该书只是从古代奴隶主编的历史书“春秋”及关东“六国时事”中，杂七杂八的搜拾了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历史经验，唯独把秦国实行法家政治的经验排斥在外。东汉人高诱为该书作序说：“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元代陈澧也说：吕不韦“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②。这都说明，

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② 陈澧：《礼记集说》

儒生是该书的主要编纂者，宣扬的是儒家的“先王之礼”。

查一查《吕氏春秋》，就可以看到它的尊儒反法的反动本质是非常清楚的。

《吕氏春秋》中极力吹捧孔老二，特别是把孔老二那股复辟奴隶制度的顽固精神吹得十分肉麻。如说：谁能象孔丘那样，白天读奴隶制的经典，夜里做梦能亲自向文王周公请教，那样专心致志，就没有办不到的事^①。

《吕氏春秋》大肆鼓吹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如说什么“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②，应该成为当时国君的榜样。作者主张对于反对奴隶制的“圣制”，揭露“先王”的丑事，排斥奴隶社会的“旧典”的国君，天下人就应该把他消灭掉^③。这完全是一付奴隶制卫道士的凶象。《吕氏春秋》极力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如说“天子既绝，贤者废伏”，“当今之世浊甚矣^④。为奴隶制的崩溃而悲

① 《吕氏春秋·博志》：孔子“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

② 《吕氏春秋·上德》

③ 《吕氏春秋·怀宠》：“辟远圣制，警丑先王，排訾旧典，……若此者天下之所诛也。”

④ 《吕氏春秋·振乱》

叹，对封建制发展的革命形势大肆诬蔑。

《吕氏春秋》大肆贩卖孔老二的“仁”。如说：“仁者，仁乎其类者也。”^①意思是仁就是爱自己的同类，这和孔老二鼓吹的仁就是要奴隶主之间互相亲爱是完全一致的。又说：圣人用德要求自己，天下四面八方的人就都能归顺于仁了^②。这是孔老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翻版，都是把复辟奴隶制作为实现“仁”的目标。还说：古代的统治者，就是用仁义来治理国家的^③。“天下称大仁，称大义”的只有夏商周的奴隶主头子才够格^④。孔老二把“孝”作为维护宗族奴隶制的根本，《吕氏春秋》也鼓吹：孝是对人的“本教”，仁、礼、义、信、强，都为的是做到孝^⑤。又说：掌握一种统治术，一切好事会来，一切坏事会去，天下都会听从命令，这个术就只有孝^⑥。可见，《吕氏春秋》也把维护奴隶主之间上下级关系

① 《吕氏春秋·爱类》

② 《吕氏春秋·精通》：“圣人行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

③ 《吕氏春秋·适威》：“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

④ 《吕氏春秋·分职》

⑤ 《吕氏春秋·孝行》：“民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义；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也。”

⑥ 同上篇：“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的孝道作为复辟奴隶制度的根本。《吕氏春秋》也大肆鼓吹孔老二为挽救奴隶制的崩溃而提出的“正名”。如说：“名正则治，名丧则乱”^①。把“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等奴隶制秩序大乱的现象，诬之为“妖”^②，归结为“名丧”，妄图通过“正名”，恢复奴隶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吕氏春秋》中这些反动观点，十分清楚地贯穿着一条儒家反动政治路线，它之所以挂起杂家的招牌，就是为了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

凡是要开倒车的，同时必然反法。吕不韦为了在秦国贯彻执行反动的儒家政治路线，对法家的政治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咒骂法家商鞅忘义而趋利，是无信的小人；诬蔑法家吴起是个自大狂，最后不得好死。

法家主张“严罚厚赏”，这是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措施。严罚，主要是对奴隶主的反抗实行严厉的制裁；厚赏，主要是奖励耕战，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优势。该书露骨地攻击法家这种“严罚厚赏”的政策，如说：“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

① 《吕氏春秋·正名》

② 《吕氏春秋·慎大览》

赏”，“此衰世之政也”。还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努力），不罚而邪止（不会发生奴隶造反）。”^①妄图用儒家的“德”和“义”，来代替法家的赏和罚，实际上就是不要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在“德政”的幌子下把奴隶主扶上台。该书攻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暴虐姦诈”，与儒家的“义理”是相反的，“其势不俱胜，不两立。”^②这充分暴露了作者与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誓不两立的反动面目。法家主张用郡县制度代替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度，《吕氏春秋》却竭力提倡恢复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大夫的层层分封制。说什么国家方千里就可以了，“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居然认为国家越是分裂，传世就越长久，名声就越响亮^③。作者攻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暴政”，主张对实行“暴政”的应该讨伐，但是，要“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④，克其国以后“举其秀士而封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⑤。怎样才算“贤者”和“秀士”呢？

① 《吕氏春秋·上德》

② 《吕氏春秋·怀宠》

③ 《吕氏春秋·慎势》：“观于上世，其封建（即分封）众者，其福长，其名彰”。

④ 《吕氏春秋·去私》

⑤ 《吕氏春秋·怀宠》

“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①。这就是说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后，要分封那些最能遵守奴隶主道德的顽固派。这就是要破坏在秦国行之已久的郡县制度，就是要变地主阶级专政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法家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因为在这个大动乱时期，只有加强君主的权力，才能统一地主阶级的意志，才能有效地打击分散的奴隶主独立王国。《吕氏春秋》却坚决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国王要变成“无知、无能、无为”^②的傀儡，好让奴隶主复辟势力任所欲为。作者认为：国王如果好用专政的暴力显示自己的能力，喜欢发号施令显示自己奋发有为，大臣们以不和国王争权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以听从命令来向国王讨好，这都是乱了君臣之道^③。作者主张君主应把精力放在“求贤”上，让那些受奴隶主拥护的“贤者”掌权。甚至鼓吹王位也应该“禅让”，象尧舜那样“皆以贤者为后”^④。吕不韦一向是以“贤者”自居的，他的门客、辩士、

① 《吕氏春秋·正名》

② 《吕氏春秋·分职》

③ 《吕氏春秋·任数》：“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

④ 《吕氏春秋·圜道》

死党、爪牙也为他吹锁呐抬轿子，把他捧为头号“贤者”，他鼓吹“禅让”，充分暴露了他图谋篡夺秦国最高权力的政治野心。

《春秋》本来是当时历史书的通称，那时的历史书是宫廷里教育太子的教材。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是企图用它来教育秦始皇的。吕不韦在《序意篇》中直言不讳地说，这部书是为了效法古代帝王黄帝教诲他的继承人颛顼(音专须 zuānhū)的经验写的。他胡吹这部书把“治乱兴衰”、“寿夭吉凶”的道理全都包括进去了，读了它就能判断“是非”，做事知道“可不可”等。显然，他是要训导秦始皇按照《吕氏春秋》中所说的立身处世，循“仁”顺“义”，学习“君子无为”，即是长大了，也要乖乖地让“仲父”独揽大权。在这部书中直接针对秦始皇的说教是很多的，他捏造的齐桓公让被称为“仲父”的管仲独揽大权就是一例。原文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① 意思

^① 《吕氏春秋·任数》

是说：做国君无知无为比有知有为好，这是作国君的诀窍。办事的人向齐桓公请示，齐桓公说：你去问仲父怎么办。办事的人又向齐桓公请示，桓公还是回答，问仲父去。这样连续好多次。桓公的近臣便嘟嘟囔囔说：一回是问仲父，二回还是问仲父，啥都问仲父，做国君就那么容易。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的时候，自己受作难也没办法，得到仲父以后，为什么我做国君能不容易呢？吕不韦说这些话，就象对秦始皇耳提面训一样：你执政以后还要听我的，要象齐桓公对管仲那样，尊重你“仲父”的权力。

总之，《吕氏春秋》充分反映了吕不韦以孔孟之道为反动思想武器，妄图改变秦国的法家路线和政策，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复辟奴隶制度的政治野心。这同厚今薄古的法家秦始皇的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

吕不韦不仅存着复辟希望，而且极力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吕不韦拉拢和收买了一个名叫嫪毐的人，让他冒充宦官混进秦国的宫廷，受到了秦始皇的母亲秦太后的宠爱。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在宫闱内胡作非为。吕不韦、嫪毐狼狈为奸，结成暗藏的复辟集团。他们利用职权掠夺奴隶。吕不韦拥有一万多奴隶，继续用奴隶经商，成为秦国最大的奴隶主；嫪毐

也有奴隶几千人，食客一千多。他们极力干扰和破坏郡县制度的推行。秦庄襄王时蒙骜(音敖áo)领兵打败韩国，在新占领的地方设置了三川郡(今河南洛阳、荥阳一带)，吕不韦就迫使庄襄王兑现“共分秦国”的诺言，把河南洛阳十万户划为他的封地，实际上把三川郡的大部变成他的独立王国；秦始皇即位不久，蒙骜领兵平定了晋阳的叛乱，重建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吕不韦和太后勾结，把太原郡改为嫪毐的封国。吕不韦还极力把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主张付诸实践，力图把已经打倒了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他一执政就一反范雎实行的“强公室，杜私门”，打击奴隶主贵族的政策，而实行“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①的反动政策，放反动势力出笼，重用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卫国是吕不韦的故国，早已被魏国灭亡，吕不韦惟恐他的奴隶主祖宗绝了种，在他当政期间，竟将灭亡达十一年之久的卫国后裔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重新复国。这是对历史的反动。

在秦始皇亲政的前一年，吕不韦和嫪毐为了实现

^① 《史记·秦本纪》

其篡权复辟的阴谋，却竭力扩充势力。吕不韦在这年公布了《吕氏春秋》，大肆宣扬自己的主张。他把《吕氏春秋》的书筒挂在咸阳的市门上，旁边挂着布告说：谁能对这部书增减一字，赏给千金。千金的赏格就悬在书筒上面，似乎当下就可以兑现。但是，人们都领教过吕不韦的淫威，一看是他的大作，那个也不敢增删一字。实际上，吕不韦根本不是想让人给他修改作品，那不过是这个政治奸商采取的抬高《吕氏春秋》价格的手段罢了。他如此大吹大擂，目的是要在秦始皇亲政前把他的反动学说定为一尊，取得社会上的承认，用他的改装了的孔孟之道来代替法家思想，大肆制造复辟奴隶制的气氛。这一年，嫪毐和太后的丑事也被秦始皇发觉了。他们狗急跳墙，暗地里组织了包括主管宫廷禁卫的卫尉竭、咸阳的最高长官内史肆等二十多名重要官员在内的别动队。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取而代之，把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改变为奴隶主专政。

吕不韦、嫪毐集团是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地盘、有打手的奴隶主贵族复辟集团。在这个反动集团的把持下，不仅条件成熟了的封建统一事业迟迟没有进展，而且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岌岌可危，时刻有被颠覆的危险。是沿着吕不韦、嫪毐已经造成的政

治局面逆转下去，丧失商鞅变法以来的封建改革成果，使历史倒退；还是粉碎吕、嫪集团的阴谋，把反对奴隶制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动历史前进？这是秦始皇面临的严峻考验。秦始皇断然选择了后一条路，和吕、嫪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公元前二三八年，嬴政二十二岁了，按照秦国的制度要举行“加冠”典礼，表示已经长大成人，从此才能亲自主持国政。这个大礼是在秦的旧都雍（今陕西凤翔）的蕲（音其qí）年宫里举行。就在秦始皇举行加冠礼这天，吕不韦事先策划的嫪毐武装叛乱发生了。从咸阳来的军使向秦始皇报告：长信侯嫪毐盗用秦王的御玺，调集大量军队，正在筹划向蕲年宫进攻。秦始皇当机立断，命令昌平君、昌文君立即发兵反击。两军在咸阳一交锋，受嫪毐蒙蔽的叛军明白了真象，纷纷反戈一击，全部叛军顷刻瓦解，嫪毐等抱头窜逃。秦始皇通令全国，悬赏捉拿，嫪毐及其党羽全部落网。秦始皇车裂了嫪毐，软禁了太后，把二十多个主要叛乱分子处死；对于嫪毐的党羽四千多人，按罪行轻重分别作了处理，有的罚劳役，有的削官夺爵、有的流放到边疆。对于参加平叛有功的一律赐官爵一级。这样一场大叛乱，被迅速平定了。

秦始皇在镇压了嫪毐叛乱后，继续追查这一案件

的真象，终于“具得情实”^①，查出嫪毐的后台就是吕不韦。但是，吕不韦在秦当政年深日久，势力根深蒂固，为他辩护的门客辩士太多，只能逐步剪除。第二年，秦始皇宣布吕不韦同嫪毐有牵连，罢免了他的丞相职务，为了防止他在咸阳捣乱，命令他迁到河南洛阳去。吕不韦到洛阳后仍不甘心失败，继续和国内外的奴隶主贵族勾勾搭搭，妄想伺机蠢动，东山再起。秦始皇为了防止变故发生，就写了一封信严厉谴责吕不韦的罪行，并命令他和家属迁到蜀郡去。吕不韦在阴谋被揭发后，无可奈何，于是就喝下一杯毒酒，畏罪自杀了。吕不韦死后，其党羽继续猖狂活动，竟有不少人公开为这个反动分子治丧。秦始皇又果断地处置了这些家伙：除大部夺爵、流放外，凡吕不韦从外国招来的反动儒生，一律驱逐出境。

二十五岁的秦始皇，以大无畏的法家精神和卓越的政治才干，彻底粉碎了吕不韦、嫪毐奴隶主复辟集团，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初试锋芒的秦始皇，就敢于藐视和打倒那些庞然大物，不愧是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家。

青年时代的秦始皇，就是一位坚定的法家思想的

① 《史记·吕不韦列传》

尊崇者。代表前期法家商鞅思想的《商君书》，大约在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的后期，由范雎等根据商鞅的奏稿、法令、演说、答辩等材料，再加上当时正在推行的法家政策和事功^①汇编问世的。这部书在战国晚期已广泛流传^②，既是秦国各级官吏必读的文献，自然也是秦始皇小时必读的课本。由于他自幼饱受法家思想的熏陶，因而能够抵制儒家反动思想的腐蚀。秦始皇在清除了吕、嫪复辟集团后，当然要按照法家思想来治理秦国。他极力选拔法家人才做秦国的重要官吏，其中最受重用的是李斯和尉繚。

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是荀子门下的高材生，法家思想的实践家。他从荀子那里学到法家理论后，就和他的老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们认为，楚国奴隶主贵族势力太大，政治黑暗，没有什么希望，其他五国都很衰弱，只有秦国蒸蒸日上，而且最能采用法家的主张。于是，李斯决然到了秦国，他向秦始皇描绘了统一天下的宏伟蓝图，秦始皇立即拜他为长史（秦国官府主管文书的长官）。

①如《商君书》中记载的最迟的事件是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是范雎当政以后的事功。

②《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臧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商指《商君书》。

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对朝廷重用法家人物是坚决反对的。恰巧这时发现了在秦国修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原是韩国派来的间谍，奴隶主贵族以这件事为借口掀起了一个“逐客”运动，目的是要赶走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人物。李斯给秦始皇上了《谏逐客书》。他历举秦国过去重用商鞅、范雎等外籍客卿所做出的贡献，有力地驳斥了旧贵族对法家的攻击和污蔑。他说：不生于秦国的士人，愿意为秦国效忠的不少。不管是非曲直，不是秦国人就驱逐出境，那就必然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对秦国是非常不利的。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撤消了逐客令，粉碎了奴隶主贵族的阴谋，从此更加重用李斯。李斯后来长期担任秦始皇手下的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和丞相，是秦始皇的一个得力助手。

尉繚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人，本名繚，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法家。他对兵法很有研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形势家”类中有《尉繚》三十一篇，就是他的军事著作（今已失传，今本《尉繚子》是伪书）。在秦始皇撤去吕不韦丞相职务那一年，他来到秦国，劝说秦始皇进一步推行法家政策。秦始皇一见他就谈得非常投机，置之上座，特别尊重，连吃饭睡觉都陪繚在一起，并起用繚担任国尉

的重职，所以又称尉繚。国尉，就是后来秦朝中央政府三个最高行政长官之一的太尉，是主管军事的总参谋长。尉繚是秦始皇指挥统一战争的重要助手。

稍后，秦始皇读到韩非的著作，深深被作者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所打动。韩非也是荀子的学生，韩国人，曾向韩王建议变法，未被采纳，于是退而著书，写出十余万言的论文，成为集战国法家理论之大成的后期法家的杰出代表。秦始皇先读了韩非的《孤愤篇》，这是韩非在奴隶主贵族当权的韩国想变法革新而遭到碰壁，发抒其孤立无助悲愤填膺情绪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揭发了法家与当权的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即“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指出在韩国奴隶主贵族有五种胜利的条件，法家人才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时时有被明杀或暗杀的危险。韩非这种坚定的法家立场，使秦始皇感到十分钦佩。接着秦始皇又读韩非的《五蠹篇》。“五蠹”是说儒生、说客、游侠、工商业奴隶主、逃避耕战的人，是腐蚀封建国家的五种蛀虫，必须坚决除掉。在这篇文章中，韩非狠批了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提出了发展进化的历史观。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随着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他把

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他强调“当今之世”的封建制取代古代的奴隶制是一大进步，新兴地主阶级比没落奴隶主阶级要高明。他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必须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一句话，他认为儒家那套记述“文武之道”和“先王之语”的书简，是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的反映，对于地主阶级专政起着极大的危害作用，必须坚决予以取缔。秦始皇对韩非这种旗帜鲜明的厚今薄古理论，非常赞赏。他不由得感叹地说：“我如果能见到这人，和他交交朋友，真是死也无所悔恨了！”秦始皇为了得到韩非，连忙发兵攻打韩国，韩王赶快把韩非送来求和。秦始皇和韩非见面后，谈得很融洽，很想重用韩非。但是，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对韩非的入秦十分恐惧，李斯对韩非也有点嫉妒。特别是有个叫姚贾的人，由于韩非曾向秦始皇揭发过他的老底，成了韩非的死对头。姚贾反过来趁机谗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间谍，大王千万不能用此人！”韩、秦是敌国，姚贾的谗言又说得活龙活现，不由秦始皇不信，韩非因此入狱。秦始皇考虑了很久，觉得韩非毕竟是个少见的人才，最后下令释放

他出狱，还想重用他。可是，已经迟了，姚贾等人已经设计逼迫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了。韩非虽然死了，但他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法家理论，为地主阶级最后战胜奴隶主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韩非所制定的路线、理论、政策的胜利。

秦始皇镇压吕、嫪复辟集团和保护、重用法家人物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在粉碎魏冉集团之后又一次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重大政治斗争，是法家政治路线与儒家政治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回合。秦始皇经过这场斗争，把一大批奴隶主复辟势力清洗出秦政权，法家人物相继受到重用，组成了一个以法家为主体的新的领导核心，制止了政治形势的逆转，巩固了法家路线在秦国的统治地位，为统一中国在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

二、结束诸侯割据混战局面， 第一次实现了统一中国

结束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完成封建统一事业，是历史给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秦始皇提出的最迫切的任务。

由于诸侯割据混战局面的存在，有利于奴隶主贵族势力的继续保存和进行复辟活动，阻碍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阻碍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诸侯连年混战，赋税徭役不断加重，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有的被迫“嫁妻卖子”，重新沦为奴隶。因此，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迫切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封建政权，以便有效地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扫除奴隶制残余，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希望尽快地摆脱割据混战的灾难，出现一个统一的和平的生产环境。在奴隶主贵族压迫下的奴隶，当然更希望通过国家的统一而获得解放的机会。同时，广大劳动群众通过前仆后继的阶级斗争，改变了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力量对比，改变了先进的秦国与落后的六国的力量对比，形成了以秦为中心的统一力量；又通过长期的生产斗争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为实现全国政治上统一准备了物质条件。所以，在战国末期，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同封建制必然彻底代替奴隶制的历史潮流融汇在一起，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在秦始皇手里能够完成封建统一大业的根本条件。

但是，秦始皇不是消极地对待这些条件，不是在历史趋势面前无所作为，坐等胜利，而是在统一事业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秦始皇坚决执行了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统一战争过程中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因而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

秦始皇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为了贯彻法家的政治路线，采取了三项重要政策。一是继续推行法家奖励耕战的政策，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组织了强大的战斗队伍，既有效地动员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又充分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保证了秦国在统一战争中“财用足，民利战”^①，越战越强。二是在军事胜利的过程中，为了巩固战果，采取了一项重大的政治措施，即把灭掉的诸侯国改设为郡县，把新占领区内的奴隶主贵族和大商人迁徙到容易控制的地方和边远地区，扩大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三是在用战争手段消灭六国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同时，每到一处立即发布文告宣布：凡是遭受奴隶主贵族囚禁的“罪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奴隶），一律无罪释放，恢复人身自由^②。当时，贵族们在兵

① 《汉书·晁错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武殄（舔 tiǎn）暴逆，文复无罪”。

源不足的时候，往往把“罪人”编成军队，开上战场。齐国的军队就是把“罪人”加以“技击”训练编成的，打仗有功的还要纳八两铜钱，才能赎得人身自由^①。这种政策的推行就起了瓦解敌人，争取群众的作用。由于六国人民不愿意为旧贵族卖命，甚至希望秦军的到来，因而促成六国在抗秦战争中的失败以至灭亡。例如：秦军打入齐国时，齐国人民根本不抵抗；韩国、魏国、燕国的贵族也都无法动员人民与秦作战。

秦始皇十分重视对六国发动政治攻势。过去，在秦和六国的战争中，秦的军事上的优势，常常被六国的“合纵”（即联合抗秦）所挫折。这时秦国虽然强大，但如果六国联合行动，一致抗秦，统一的计划也是很难实现的。秦始皇采纳了尉繚的建议，以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各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广泛地开展政治活动，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乱六国原订的种种计划，防止六国的“合纵”。这个策略经李斯等的具体执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统一战争的十年间，始终是“诸侯服秦，莫敢合纵”，六国一个一个在“举

^① 《荀子·议兵篇》

国不足以当秦”^①的情况下被秦国消灭。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古风》中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诗句。的确，由于秦始皇在指挥统一战争中执行了法家的军事路线，因而能象“飞剑决浮云”一样，迅速消灭六国诸侯。

当时，赵国号称“强赵”，虽然多次受到打击，仍然是秦国的劲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原拟从灭赵开始，他设想“打蛇先拦头”，把赵国一灭，其他五国都会抱印投降，这样统一的步伐就加快了。于是，公元前二三二年，秦始皇派秦军分南北两路伐赵。南路军已抵邺（音业yé，今河北磁县东），北路军从太原出发，前锋直达邯郸不远的番吾（今河北平山县东）。当赵国发现秦国大兵压境时，便调遣原在北方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侵扰的军队迎敌。这支赵军由当时的北方名将李牧指挥，经过长期的战斗锻炼，战斗力很强，且准备和秦拚一死战。秦军前锋和李牧军在番吾一接触，就被李牧军打得丢盔掉甲，败下阵来。秦始皇发现铜锤碰上了铁叉，硬碰硬了，这

^① 《史记·刺客列传》

样打下去至少是一个消耗战，说不定还会被李牧拖住，再演出诸侯救赵的事来。这时，秦始皇便主动撤回部队，改变战略，不打消耗战，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硬拚。然后选定从六国中最弱小的韩国开刀。公元前二三〇年，派内史腾率兵进攻韩国，俘虏了韩王安，把所得韩地置为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迅速灭掉了韩国。

对于赵国，秦始皇当然是决心要干掉的，不过是要等待时机。公元前二二九年，秦始皇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之后的时机，派王翦领兵攻赵。然而还是不行，“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①，王翦屡次受挫，一年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秦始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赵国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加剧，结果赵王迁杀死李牧。李牧的被杀引起军队对统治集团不满，上下相疑，原来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军队象放了气的皮球，塌下来了。秦始皇抓住这个时机，命令王翦大举进攻。公元前二二八年，秦军长驱进入邯郸，赵王迁被迫献出地图降秦。秦始皇亲自到邯郸受降，对赵国的大奴隶主贵族实行了严厉的惩办。赵公子嘉逃到代

^① 《战国策·赵策四》

城（今河北蔚县一带），自立为代王。灭赵的战争只留下这个尾巴。

秦军在追逐赵公子嘉时，大军打到燕国的西南边境。燕国奴隶主面临覆灭的威胁，想不出抵抗的办法。奴隶主贵族的顽固代表燕太子丹认为：如果拿燕军去打秦军，简直象拿鸡蛋去碰石头。燕国人民巴不得秦军来消灭他们，动员人民的事根本不可能。去联合各国诸侯吧，也不行，韩国已亡，赵国也差不多完蛋了，魏国和齐国早已归顺了秦国，楚国又离得太远，帮不上忙，合纵抗秦的梦也做不成了。但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决定了太子丹要靠施展阴谋诡计进行垂死挣扎。公元前二二七年，燕太子丹派亡命徒荆轲充当刺客，随带投奔燕国的秦叛将樊于期的头连同燕国的军事地图，献给秦始皇，伪装“归顺”；并将一把匕首裹在地图里面，伺机刺杀秦始皇。结果阴谋败露，荆轲被秦始皇剁成肉泥烂酱，在咸阳宫中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燕太子丹导演了“荆轲刺秦王”的暗杀阴谋，不但阻止不了历史前进的潮流，反而加速了燕国奴隶主贵族的灭亡。秦始皇立即派王翦、辛胜领兵攻燕，在易水以西击败了燕军主力。公元前二二六年，王翦领兵攻下了燕都蓟（音记jì，今河北大兴县西南），燕王喜逃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西

北)。秦始皇派李信领兵跟踵追击，燕王喜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谢罪求和。

燕王喜虽然还在苟延残喘，但已不值一击了。这时已到深冬季节，大雪封山，行军不便，秦始皇便把北方的军队撤回，派王贲（音奔bēn）为大将，率领十万人马去打魏国。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军包围了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放黄河、鸿沟水进灌大梁，三个月后大梁城被攻破，魏王假投降，魏亡。

秦始皇灭了魏国，打算去攻打楚国。楚国是东南大国，地大人多，能够动员大量的军队，是当时秦国一个强硬的对手。秦始皇起初派李信为大将，蒙武为副将，率领二十万人马去伐楚。李信是一员猛将，但战斗经验不足。他拿出追击燕太子丹的那股猛劲，一鼓作气地攻下平舆（今河南武宁县东南），一直打到离楚都不远的西陵（今湖北省黄冈县西北），钻进了项燕设置的包围圈。原来项燕率领楚国的主力部队在那里早已分成七处埋伏着，两下里一交手，七处伏兵一齐起来，李信一败涂地。李信军跑了三天三夜，还没有逃出项燕的包围圈，秦军七个都尉被杀，士兵死伤无数，一直被楚军追到平舆。这虽然是一次大败仗，但秦始皇从失败中吸取了经验。他接着派王翦带六十万大军继续击楚。他总结了李信轻敌冒进、孤军

深入的教训，依靠秦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粮草供应的有利条件，给王翦制定了屯兵练武、坚壁不战、以逸待劳、麻痹敌人的战略。王翦率秦军在与楚交界的地方稳扎下营盘，教士兵整天跳远、跳高、扔石头，安心地守住阵地，不搭理楚军挑战的碴儿。秦始皇统筹全局，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这样过了一年多，楚军的斗志渐渐松懈，而且以劳对逸，粮草不足，难以持久，“乃引而东”。王翦乘楚军向东撤退的时候，率秦军排山倒海似的追击，迅速消灭了楚军的主力。公元前二二四年，秦军占领了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音除chū）。这时，秦始皇亲自到寿春及楚的旧都郢（音影yǐng，今湖北江陵北）去巡视，并亲自安排了彻底灭楚的战事。公元前二二三年，王翦又率军渡过长江，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今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部）。于是楚国全部灭亡。

灭楚以后，秦始皇派王翦的儿子王贲为大将，再去清除燕、赵残余。公元前二二二年，王贲打下了辽东，俘虏了燕王喜，接着就打下了代城，俘虏了代王嘉。燕、赵彻底灭亡。

五国既灭，山东海滨的齐国就成了奴隶主贵族麇（音均jun）集的地方。在秦军打击下，韩、赵、魏、

楚漏网而逃的奴隶主贵族，最后都集结在齐国，他们和齐国的奴隶主贵族勾结起来，图谋组织反动武装，负隅顽抗。齐国即墨地区的奴隶主贵族对齐王建说：

“三晋（指韩、赵、魏）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今山东东阿县西）鄆（今山东濮县东）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临晋关，在今陕西朝邑附近）之间可以入矣。鄢（今湖北省宜城县西南）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附近）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①正当奴隶主贵族蠢蠢欲动的时候，秦始皇命令王贲在灭燕之后率军南下，向齐国进攻。公元前二二一年，王贲率几十万秦军象泰山压顶一样打进齐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那一小撮奴隶主贵族虽然想顽抗，可是在战场上的兵士巴不得秦军早些来，根本就不抵抗。不几天工夫王贲就打进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齐王建投降，最后剩下的一个齐国也灭亡了。奴隶主贵族负隅顽抗的酣梦彻底变成泡影。

秦始皇根据他的法家军事路线，采取了灵活机动

① 《战国策·齐策》

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攻打六国。从灭韩开始，再南北出击，破赵、燕，灭魏、楚，横扫两翼，然后歼灭齐国，前后十年，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割据混战的局面。秦灭六国之后，又适应中国历史趋势，进一步统一了分布在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两广地区的部族，北面打退了我国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骚扰，修建了“万里长城”，以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建立起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民族的封建国家。这在当时的历史上是个空前的创举。

秦始皇领导的统一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它摧毁了诸侯割据称雄的藩篱，扫荡了奴隶制残余的污泥浊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的。汉武帝时的严安，高度评价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说他“蚕食天下，并吞战国”，“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①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是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没落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史，也是改革比较彻底的国家战胜改革不彻底的国家的历史。秦之所以能消灭六

^① 《汉书·严安传》

国，并不是由于几个能征善战的将领起了决定作用，而是由于秦始皇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他所实行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法家路线起了决定作用。王翦父子的战功当然是不可抹煞的，但他们的作用也只有在秦始皇正确路线的指挥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就能征善战而言，王翦与李牧相比，无论军事谋略，还是勇猛冲杀，都差一筹。但因为赵国的政治路线不正确，李牧虽屡打胜仗却未能善终；而王翦在秦国则能为统一六国而战，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这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在阶级斗争中个人是受一定的政治路线支配的。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以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也是没有出路的。

三、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 普遍推行郡县制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割据局面，是与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相联系的。分封制是奴隶主专政政权组织形式，按这种制度，奴隶主贵族从最高统治者——天子开始，按照他的家族关系的尊卑亲疏，规定了各个等级间的继承和分封的制度，用以进行统治权力和财产的分配。西周的制度是：天子

只直接统治京城周围一千里的王畿，其余的土地划为封国，分封他的兄弟亲戚做诸侯，叫他们代为统治，辅翼王室。诸侯在他们的封国内也只直接统治一百里，其余的土地划为采邑，分封给他们的兄弟亲戚去作卿大夫。卿大夫以下有士，也分封给土地。天子就采取这一级一级的分封方式，建立了一套种族奴隶主的宝塔式的等级制度，对广大奴隶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分封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各级奴隶主的封爵都是世袭的；二是他们在封地内有政治、经济、军事的自主权，俨然是自成一统的奴隶主独立王国。但是，当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起来后，经济基础变化了，建筑在奴隶占有制基础上的分封制也发生了动摇。在新兴地主阶级掌权后，力图用适应封建统一集权需要的政权组织形式——郡县制代替分封制；而奴隶主贵族却始终拚命地维护和恢复分封制。秦国由于奉行了法家政治路线，郡县制不断加强，分封制逐渐削弱。关东六国虽然也曾不同程度上推行了郡县制，但由于儒家反动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分封制的回潮比较突出，奴隶主的独立王国仍然是星罗棋布，普遍存在。奴隶主贵族凭藉他们的世袭封地，反对变革，反对统一，这就是诸侯割据局面长期存在的基础。这样以来，在思想领域里，分封制同郡县制的争论就成了战

国到秦时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要复辟奴隶主贵族专政，就要求恢复分封制；法家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要求实行郡县制。这是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权问题上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法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胜利。但是，在胜利的形势下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奴隶主贵族代表及反动儒生，利用秦王朝百废俱兴的时机，采取孙行者钻进肚皮的战术，大批混进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妄图改变秦的路线和政策，疯狂进行复辟活动。斗争显得更复杂、更激烈了。公元前二二一年，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挑起的复辟分封制还是推广郡县制的论战，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全国后，在建立怎样性质的政权问题上的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在这场论战中，首先跳出来的是窃取丞相要职的王绾。他向秦始皇上了一个奏章说：“现在诸侯灭亡不久，燕、齐、楚三个国家地方太远，不给那里封诸侯王，没法子管理。请求把皇上的几位王子封为侯王。”尽管王绾建议分封的人选不同了，但是作为分封制的实质是一脉相承的，这不过是奴隶主贵族的战略诡计。秦始皇把王绾的意见交付廷议，多数大臣表

示赞成，唯独廷尉李斯力排众议。李斯驳斥说：“周文王、周武王确实分封过很多子弟为王，但后来象仇人一样互相残杀，长期割据混战，那一个也不听周天子的话。现在天下得到统一，应该全部实行郡县制。至于王子功臣，用赋税收入给予优厚的赏赐就够了。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永享太平。分封诸侯是错误的。”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并指出：“诸侯割据是造成几百年来混战不休的祸根。现在天下好不容易才统一，又去分封诸侯，这等于重新制造兵祸。那要想天下安宁就困难啊！”王绾碰了钉子，他的支持者也不敢吭声，奴隶主贵族搞复辟、开倒车的阴谋被当场粉碎了。通过这场辩论，使秦始皇看穿了王绾的反动面目，对李斯更加信任，后来，便把王绾罢免了，升李斯为丞相。

在这场斗争之后，秦始皇坚决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彻底废除了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分土封侯”制，对于子弟功臣也不给尺土之封，坚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单一的郡县制。他立即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后来增加到四十多郡，由中央委派官吏进行统治。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①，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帝国。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郡县制是为适应新兴地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维护封建统一，实现中央集权的地方组织机构。它与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相比，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特点：一是官吏的职务不能世袭，中央有权随时任免，这便于从地主阶级中广泛选拔人才；二是各级官吏在他们管辖的地区，没有政治、经济、军事的自主权，都必须执行中央统一的政令，不能搞独立王国。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在郡一级设郡守掌管全郡政务，设郡尉掌管全郡军事，设监御史负责监察工作，互相牵制，直接听令于中央。一郡之内分为若干县，人口在一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小县设县长，县令或县长掌管全县政务，直接受郡守节制；设县尉掌管全县军事；设县丞作为县令或县长的助手，并掌管司法裁判。一县之内分为若干乡，每乡设三老掌管封建教化；设嗇夫管司法和赋役；设游徼（音绞 jiǎo）管治安。一乡大体有十亭，亭有亭长。一亭大体有十里，里有里正。这种层层管辖的政权机构，使秦政权成为一架有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机器。皇帝下一道命令，经过中央办事机构，可以一级一级下达到各个角落。实行这种制度，中央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地方才能做到必须服从中央，所以，郡县制度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基础。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是：“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秦始皇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还改革了中央官制。设立了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三公，即左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帮助皇帝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皇帝的耳目，主管监察朝廷官员的工作。三公以下有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分别掌管中央九个部门的事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主管全国司法的廷尉，主管全国财政收支的治粟内史，主管宫廷收支和营造的少府，主管接待各地少数民族首领的典客，主管皇帝警卫工作的郎中令。这些机构组织严密，分工具体，事有专管，但都是根据皇帝命令办事的，是皇帝实现最高权力的手臂。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当然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进行革命的根本问题，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就是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政权形式。韩非为了适应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需要，极端地强调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如果不实行中央集权，那就好比小腿还比大腿粗（腓大于股），没法走动，奴隶主贵族就会象老虎一

样吃人。实行中央集权制，才能够巩固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能做到“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① 貌似大虎的奴隶主贵族就不敢乱说乱动了。秦始皇建立的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对韩非制定的中央集权制理论的创造性的实践。这种政治制度的建立，在铲除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独立王国，防止诸侯割据局面的重演，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反对奴隶制复辟的斗争中起了革命的作用。这是法家政治路线的又一重大胜利。

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开创的“郡县制”，在封建社会一直被沿用下来，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长期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起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基本上是统一的，处于分裂状态的主要是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唐末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分裂时期的历史表明，每当“郡县制”遭到破坏，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也就开始了。

唐代杰出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在他的著名论文《封建论》中，热烈赞扬秦始皇“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正确政策，驳斥了孔孟的徒孙们散布的“郡

^① 《韩非子·扬权》

县”不如“分封”的种种谬论。

分封制的鼓吹者说：分封制是儒家所谓的古代“圣人”制定的制度，应当垂之万世，不可更改。秦始皇改革了，简直是大逆不道。柳宗元针锋相对地提出“势”的概念，从历史进化的角度，驳斥了这种保守复古的谬论。他指出：分封制并不是哪个“圣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出来的，而是客观形势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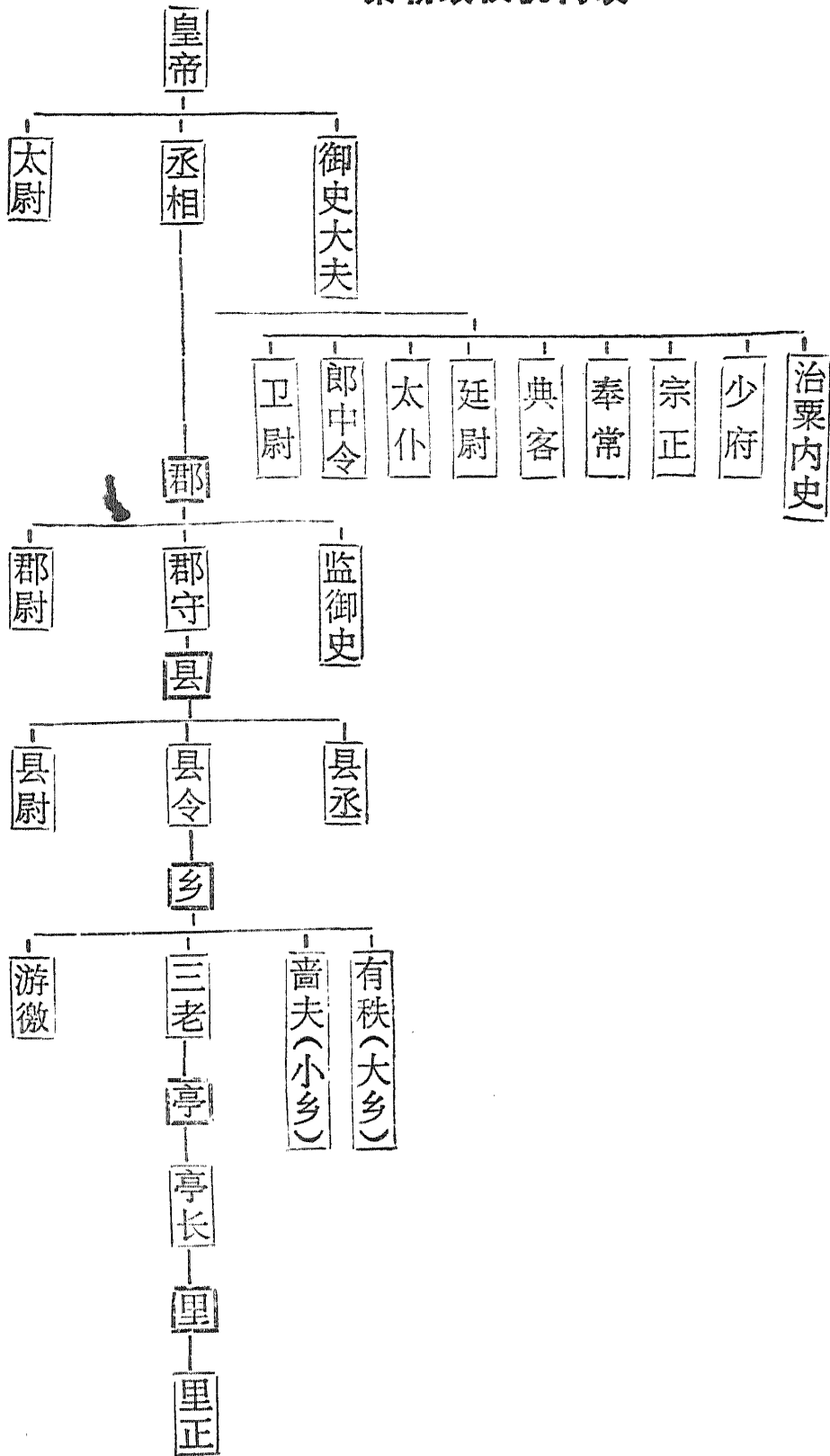
“圣人”只能接受这个历史形成的客观现实，就是想改也改不了。引伸开去，分封制让位给郡县制，也同样是“势”的作用，“非圣人意”。孔孟这些儒家“圣人”曾极力想维持和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终于都失败了。柳宗元虽然对“圣人”还有一些回护，这是他的不彻底处。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那个顺应历史潮流，乘“势”变革，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秦始皇，超过了儒家的“圣人”，而是法家的“新圣”。

分封制的鼓吹者说：周朝实行分封，结果延续了八百年；秦朝实行郡县，结果二世而亡。在他们看来，秦的速亡主要是由于实行郡县制。柳宗元反驳说：周朝实行分封制，促成了“诸侯强盛，末大不掉”的分裂动乱局面，周天子实际上“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早就成了空架子，所谓八百年天下，完全

是虚假的。秦实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做到了“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正是“其所以为得”。至于秦朝“二世而亡”，不是因为推行郡县制的过失，而是政策上犯了错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亡是由于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促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结果。所以，“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失也”。决不能因为秦“二世而亡”而否定新的社会制度。

分封制的鼓吹者说：分封是天子与诸侯共治共守，也就是“公天下”；秦行郡县，“殊非至公”，完全出于私心，不符合儒家“圣人”的道德标准。柳宗元反驳说：分封制倒是出于天子的私心，是要诸侯为自己出力，为自己保卫子孙，其实是“家天下”。分封制由于层层世袭，处处限制，贤者不能行其道，不肖者又无法撤换，那才是“非公之大者也”。柳宗元认为，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诚然是出于私欲，但是，郡县制摆脱了世袭分封制的层层束缚，便于中央直接控制官吏的选择和罢黜，官吏的任用能做到“有罪得以黜，有能者得以赏”，可以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利于统一集权的封建统治，有利于推行进步的政治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他得出的结论：郡县制倒是“公之大者”，“公天下之端自

秦朝政权机构表



秦始”。柳宗元终究不过是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他讲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公私观。他所谓的“公天下”，至多不过是公封建政权于地主阶级全体。但是，他摒弃了传统的道德原则，把是否有利于历史发展作为公私的标准，从而否定了儒家吹捧为至公楷模的“圣人”，肯定了被儒家咒骂为贪残诈伪的秦始皇是大公的典范。这充分表现了柳宗元具有反潮流的识见和魄力。

四、摧毁奴隶制复辟的经济基础， 把封建生产关系推广到全国

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剧烈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秦始皇运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大力推行法家路线，实行破旧立新的经济改革，“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②

①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秦始皇虽然用战争手段打倒了六国奴隶主贵族，但他们还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时刻图谋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新兴地主阶级虽然掌握了全国政权，但在很多地方控制能力还很薄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很不巩固的。秦始皇为了摧毁奴隶主复辟势力，发展地主经济，同时进行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迁徙。

这两种迁徙，一种是强迫奴隶主贵族势力迁出他们作威作福的老巢，以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防止他们进行复辟活动。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就对奴隶主贵族采取了强迫迁徙的政策。他把奴隶主贵族从北方迁到南方，从南方迁到北方，从东方迁到西方。所以，南方的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带），北方的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西方的陇西郡（今甘肃临洮、天水一带），都曾迁入不少六国的“豪侠”^①。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战争刚结束，秦始皇立即下令，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十二万户“豪富”，至少有六十万以上人口，搜索出来强迫迁到首都咸阳，放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这是对奴隶主贵族一种“犁庭扫穴”式的打击，使他们失去了世袭的土地，失去了井

^① 《秦会要订补》 263至265页

田上的奴隶，失去了本土旧有的权势，不容易进行复辟活动。

另一种迁徙是采取免除徭役或赏赐爵位的办法，奖励移民垦殖，在地主经济薄弱的地方扶植和发展地主经济。如在公元前二一九年，把三万户迁到琅玕台下（今山东诸城县东南海边），免除他们十二年的徭役。公元前二一二年，把三万户迁到丽邑（今陕西临潼东北），把五万户迁到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一律免除十年的徭役。公元前二一一年，在打退匈奴之后，又把三万户迁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地），每家都赐给一级爵位。这种奖励迁徙和前者的强迫迁徙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长期免除徭役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而赏赐爵位就意味着让他们去当地主。因为秦的爵位是用来表示地主阶级等级地位的，有一级爵位就可以分到一百亩土地，九亩宅地，一户农奴（当时叫“庶子”），还有资格作官。这种迁徙，对于解决地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培植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是有积极作用的。

秦始皇的经济改革措施，最重要的一项是扫除了井田制的残余，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推广到全国。

井田制是中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和政治上的分封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土地制度。按殷、周

时代的井田制，天子掌握了全国的土地，根据地区的不同，划分为面积大小不等的耕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分封给各级贵族的“井田”的“经界”是固定的，不能买卖，所以又叫做“公田”。在此之外，不能再去开垦土地，否则就是非法的。一块块的井田，就是一个个奴隶劳动的集中营。各级奴隶主通过井田制，世世代代享受着对奴隶的剥削和屠杀的权力。春秋末期以来，新兴地主阶级开垦的“私田”潮水般地冲击着“公田”，井田制逐渐走向崩溃。在这个趋势面前，新兴地主阶级主张彻底废除井田制，商鞅在秦国用法律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度，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仍然要顽固地维护井田制度，孟轲在战国中期还鼓吹：实行“仁政”必须从恢复井田制中的经界开始^①，也就是搞复辟要从恢复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入手。由于儒家政治路线的干扰，关东六国土地制度的变化基本上停留在税亩制的水平上，即“公田”和“私田”都可以合法存在，因而直到秦统一时东方六国的井田制残余还继续存在。

秦始皇在对奴隶主贵族实行大摧毁大迁徙之后，

^① 《孟子·滕文公上》：“仁政必自经界始”。

公元前二一六年，向全国颁布了“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①，命令全国的地主和自耕农向政府登记占有土地的数量，按制度缴纳赋税，政府就承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这项措施是春秋末期以来一次最普遍的土地制度大变革，是商鞅“废井田”的继续和发展。通过这次大变革，彻底扫除了井田制度的残余，在全国范围内用法令的形式把封建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从而进一步铲除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经济基础。这是一项关系到生产关系的变革的根本性措施。古代生产以农业为主，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土地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这项法令的推行标志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普遍废除，封建生产关系在全国的确立。

秦始皇为了摧毁奴隶主复辟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地主经济，还大力推行了重农抑商政策。

奴隶社会的工商业全由官府垄断，叫做“工商食官”。春秋后期，奴隶起义打击了官府工商业，商人逐渐脱离了奴隶主国家的控制，给私人做买卖。商业的活跃曾经加速了奴隶制的解体，促进了封建关系的

^①黔首：指百姓，黔是黑色，秦时规定百姓用黑布包头，故把百姓叫黔首。

发展。但当封建生产方式确立的时候，商业的发展继续对封建生产方式起分解作用。封建生产方式只有在交换有限、市场有限，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稳定下来。然而，战国时期商业的活跃，农民弃农经商的众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商人依靠不等价交换、投机取巧、囤积居奇以及放高利贷等方式牟取暴利，不但榨取农民的血汗，还把整个社会都能搞得贫困起来，不利于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地主政权对财政的控制，不利于耕战政策的实施。同时，一部分在政治上被赶下台的奴隶主贵族也转来搞投机商业，形成社会上的富商大贾，成为奴隶制残余活跃的重要因素。富商大贾役使大量奴隶进行商业投机，甚至设立市场贩卖奴隶；高利贷商人和奴隶主贵族相结托，“连车骑，交守相”，“贯贷行贾徧郡国”^①；破落的奴隶主贵族为了搞复辟，常常向商人借钱，商人也热衷这种政治性的投资，周赧王就是靠向商人借债进行复辟活动的；所以，富商大贾往往是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经济后台。这就使新兴地主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不能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所谓“重农”，就是发展农业，扶植地主经济；所谓“抑商”，

^① 《史记·货殖列传》

就是打击奴隶主商人，把商业控制在封建经济允许的范围内。

重农抑商政策的创始人是商鞅，他下令 罚 从事“末利”的商人做奴婢。韩非也主张把商人当作蛀虫一样除掉。秦始皇在琅玕台刻石中，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列为他的第一大功。刻石中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①”上农除末就是重农抑商。

秦始皇的抑商措施是很严厉的。他为了割断富商大贾与六国贵族势力的联系，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没收了一部分富商大贾的奴隶，并把他们当作俘虏予以迁徙。从公元前二一四年至前二一三年，在“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兵用不足”时，连续三次把大批商人和罪犯一起发配到边疆去充军。其征发办法是先征发当时的商人，其次征发曾经做过商人的人，再次征发父母或祖父母曾经做过商人的人，即征发商人的子孙。这项政策的推行，在当时有瓦解奴隶制复辟势力的墙角，巩固封建生产方式的积极作用。

秦始皇在严厉抑制商人高利贷活动的同时，对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畜牧和采矿却采取了鼓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励发展的政策。如乌氏倮（音裸luǒ），当时在乌氏（今甘肃平凉县西北）经营畜牧业，他用牛马向内地换丝绸，又用丝绸向西方戎族部落换牛马，他的牛马多得用山谷量多少。秦始皇便特别尊宠他，允许他和大臣们一起参加朝见。又如巴地（今四川重庆市北）的寡妇清，世代靠经营朱砂矿而成大富。巴靠近西南夷，不好控制，秦始皇对巴采取“从其俗而长之”的政策，所以对寡妇清也加以优待。他特地命官吏在巴筑了一座女怀清台来褒奖她。

秦始皇利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治权力，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基本上消灭了奴隶制复辟的经济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和发展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五、统一与改革文字、货币、 度量衡和水陆交通道路

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着“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的混乱现象。这是奴隶主贵族世袭分封、诸侯割据的

^①许慎：《说文解字·叙》

产物。这种现象如不消除，势必妨碍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为了消除诸侯割据的遗迹，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进行了对文字、货币、度量衡和交通道路的统一和改革。

秦始皇统一文字，当时叫做“书同文字”。

周朝的文字叫大篆（音钻 zhuàn），是少数奴隶主贵族使用的文字，笔画很繁，书写极不方便。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文字的应用较前广泛。但由于诸侯各自为政，文字也各搞一套。有的极意摹古，奇形怪态；有的任意更改笔画，异体字繁多。弄得文字形体紊乱不堪，乃至无法认识。象一个很简单的“王”字，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器物的铭文中，就看到有好几十种不同的形状。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妨碍了统一政令的贯彻。据说秦始皇的诏书传到桂林，一般人都念不下去，因为桂林原来用的楚国的文字。这就迫使秦始皇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文字改革。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命令李斯等以秦国流行的文字作基础，整理出一套“秦篆”，也叫小篆，作为法定的标准文字，笔画繁复的大篆以及六国地方性的异体字一律宣布废除。当时由李斯编写的《仓颉篇》，赵高编写的《爰历篇》，胡毋敬编写的《博学

篇》，是向全国推行秦篆的范本。可惜都失传了。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树立的七处纪功刻石，相传是李斯的手笔，无疑是标准的秦篆。这些刻石文大都磨灭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泰山刻石》还存九字，嵌存于泰山下的岱庙中庭，《琅琊台刻石》尚存八十六字，除最前六字外，都是秦二世时补刻的刻辞。从这些字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许慎《说文解字》上所录的字体，与秦始皇推行的秦篆的字体，大体上是一致的。拿这种字与秦以前的古字比较有以下主要特征：先秦古字的偏旁形体紊乱，没有固定形式，秦篆确定了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先秦古字偏旁位置也不固定，左、右、上、下、中，可以随意变动，秦篆则固定了每个偏旁符号在字体中的位置；先秦古字的字体，笔数很不一致，秦篆则在定形的基础上，又把每个字确定为一定的笔数。总之，秦始皇实行以秦篆为基础的文字改革，乃是对汉字结构的规范化，使紊乱歧异的汉字形体走向定形。这是对汉字过去长期自然发展的一次总结，对于以后两千多年来汉语书面语言的保持统一，对文化古籍的保存和流传，对我国广大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从而对国家的统一都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还在于采用了隶

书。隶书是由民间长期流传的书写得比较草率的草篆发展来的，秦朝的下级官吏在征发“徒隶”时，为了书写方便也常常采用这种字体，所以叫“隶书”。据说有一个叫程邈（音渺miào）的狱吏，把这种字体加以搜集整理，呈报给秦始皇，受到了奖励，从此隶书就被广泛地采用了。当时除了一些较为庄严、重要的文件用正规的秦篆书写，一般的下行公文都采用民间流行的隶书。隶书与秦篆在字的结构上初期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例如：变弧线为直线，变圆形为方形，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因为画弧线没有画直线快，画圆形没有画方形省，这一变，写字的速度就自然加快了。我们现在从秦代的秤锤和量器上的铭文还可以看到初期隶书的状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形体的一大转变，汉字史上称这一转变为“隶变”。隶书摆脱了古文字的束缚，把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带象形意味的秦篆进一步符号化，使汉字开始进入近代文字的阶段。秦代兴起的隶书到汉代就完全代替了篆书，隶书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今天的楷书。从隶书到楷书，主要是书体的改变，结构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秦始皇采用隶书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于汉字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国名	秦	齐	楚	韩、赵、魏	燕
统一前“马”字的不同写法					
统一后的秦篆					

正规的秦篆	秦篆草体(秦隶)	汉代隶书	楷书
	明		

和文字改革相联系的便是书写工具的改造。秦以前是用刀在竹简上刻字，秦统一后，出现了新的书写工具——笔。相传，笔是秦始皇手下打匈奴的名将蒙恬创造的，这怕未必确实。按理，笔最初一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蒙恬可能是最早提倡使用笔的人。且不论笔是谁发明的，由于秦始皇大力推广隶书，文字应用日益广泛，必然促进了笔的普遍使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的。

秦始皇统一货币，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战国时期，由于长期的诸侯割据，各国诸侯以至有封邑的卿大夫，都自行铸钱，因而货币相当混乱，形态和单位很不一致。形状象刀的叫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形状象铲的叫布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圆形圆孔的环钱，流通于秦和东周、西周；形状象贝壳的叫铜贝，也叫蚁鼻钱，流通于楚国。黄金已作货币用，在楚国最为流行。楚国常用的叫爰（音元 yán）金，是一种扁平的黄金方块，使用时根据需要把它分切成小块支付。由于币制混乱，珠、玉、龟、贝等原始的实物货币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秦始皇统一货币，主要是铸钱权的统一，把铸钱权集中到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手里。他统一货币的措施是：把货币分为二等，以黄金为上币，用镒（音益 yì，二十两）做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作为下币，每枚上面铸半两二字，钱和实际重量一致。所谓上币，大概限于大数目的支付，如帝王的赏赐，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赠送等，民间交易主要用半两钱。同时宣布珠、玉、龟、贝、银、锡等只用作器饰宝藏，不用作货币。传世的秦半两钱数量很大，尤以咸阳及

关中一带出土的最多，轻重厚薄大略相等。常见的直径都在三厘米以上。秦始皇统一货币，克服了战国以来币制混乱、换算困难的状况，给商品交换提供了方便；实行铸币权的集中，有利于国家财政的统一，所以，后来一直成为封建社会巩固中央集权、维护财政统一的根本措施；废除各种原始形态的货币，采用了以铢两为单位的方孔圆钱，对中国铜币的形态影响极大，后来封建社会的铜币，尽管名称、重量常有变化，形制却始终保持方孔圆钱的样式。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当时叫做“器械一量”。

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也相当混乱。因为那时奴隶主贵族在自己的封地内可以自搞一套，诸侯有“公量”，卿大夫有“家量”，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也都各有一套度量衡制度。秦国的商鞅变法曾实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在咸阳出土的《商鞅量》，就是当时颁发的标准升。秦国的度量衡和东方六国不仅大小、长短、轻重不同，单位不同，进位也不相同。这种差别如果继续下去，显然妨碍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妨碍对奴隶制经济残余的进一步扫除，妨碍统一的赋税制度和官吏俸禄制度的建立。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大力推行统一度量衡的措施。

当时，秦始皇制定了一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

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差别表

单位与 比值 国别	度	量	衡
秦	1丈 = 10尺 = 100寸 = 230厘米	1斛 = 10斗 = 100升 = 1.000合 = 20.100毫升	1石 = 4钧 = 120斤 = 307.50克 1斤 = 16两, 1两 = 24铢, 1铢 = 0.67克
两周	1尺 = 23.10厘米	1斗 = 1997.5毫升	1夸 × 升 / = ? (克) 1两 = 24铢
三晋	?	赵: 1斗 = 10升 = 20益 = 2,114毫升 魏: 1斗 = 7.140毫升	1镒 = × 铢 = ? (克) 魏: 1夸 = ?
齐	?	1钟 = 10釜 = 50区 = 100铢 = 250豆 = 1.250升 = 205.000毫升	?
楚	1尺 = 22.50 ~23.00厘米	?	1斤 = 16两 = 384铢 = 251.53克
燕	?	?	?

它铭刻或模印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数值。这篇诏书的原文是：“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意思

是说：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二一年，把六国诸侯都消灭了，百姓得到安宁，开始用皇帝的称号。皇帝就命令丞相隗（音魁 kuí）状、王绾负责统一度量衡，凡是不统一而混乱不清的，都明确统一起来。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秦始皇是把商鞅制订的度量衡标准推广到全国的。如上面提到的商鞅量，侧面刻着商鞅的令文，底部补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足证商鞅所定的量与始皇再定的量，大小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只要补刻一道诏书，旧量就可以继续使用。量器一般是用铜制的，老百姓做不起铜的也可以做木的，但必须用铜片刻上二十六年的诏书，镶在木量的底上才准使用。这种木量经过两千多年，木质已经腐朽，仅存铜片，考古学家把这种铜片称为诏版。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现在的咸阳市东北二十华里的长陵车站附近（那里是秦咸阳故都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二十六年诏书的完整的秦诏版。量器还可以烧瓦的。过去在山东邹县和辽宁赤峰出土的瓦量，最近在吉林的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遗址中，也发现了秦代的瓦量，上面都有二十六年诏书。秦量在各地的发现，反映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实施情况；同时，也充分地说明，早在两千年以前，秦朝政令已经达到东北地区。衡器也就是秤，秤杆是木制的早已朽

了，用铜制或铁制的秤锤还能看到，叫做秦权^①。见于著录的秦权达四、五十件之多，有秤一斤以上的斤权，有秤一钩(30斤)以上的钩权，有秤一石(120斤)以上的石权。一九六四年三月，在西安市西郊秦阿房宫遗址的北部发现了一个《高奴铜石权》。一面有十七字的铸辞，标明铸造时间、铸工名及身份，最后有“高奴”二字，秦的高奴县是现在的陕西安塞县；另一面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和秦二世的补刻辞。这些文物都足以证明，秦代对统一度量衡是非常认真的。

从紧接着秦代的西汉的情况看，又知秦始皇手里已经在六国故地内基本实现了度量衡制度的统一。因为西汉的整套度量衡制度都是承自秦代，而当西汉前期诸侯王纷纷割据先秦六国故地时，许多诸侯王曾经铸造过承自六国传统的地方性货币，却见不到另立的度量衡制度，如果不是秦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度量衡制度的统一并已经得到稳定，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汉代以后，计量标准虽然不断发生变化，但单位名称和进位制度却始终未变，而且基本保持着全国范围的统一。这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不仅在当时对

^①权：古代的秤锤。

全国各地区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都起了促进作用，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改革水陆道路，在全国建立了水陆交通网。

战国时代，各国都有了交通大道，但由于诸侯割据的关系，道路的宽度不统一，这一国的马车到那一国路上行驶就有困难。同时，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独立王国，为了自成一个割据局面，都各自在重要的地方设堡垒，筑关塞。诸侯国之间都在交界处大筑长城，分疆裂土，阻碍交通。如果国与国之间隔着一条河流，或河水从这一国流向那一国，那么互相修筑不合理的河堤，以邻为壑，制造水患，水上交通也因此受到阻塞。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有利于分裂局面的重演，有利于奴隶主割据的死灰复燃，而不利于国家的封建统一。

秦始皇消灭六国不久，立即下令平毁六国贵族留下来的堡垒、关塞和境内长城等障碍物，并着手开辟陆路交通。公元前二二〇年，秦始皇下令开筑驰道。驰道是驰骋车马的大道，其规格是宽度五十步，约合今六十九公尺，路面高厚，用铁锤夯得很结实，中间供皇帝通行，列树标明，两旁任人行走。驰道的规模是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作折扇

形展开：东北通向旧燕国地，即今河北省北部以至辽宁省境内；东面通向旧齐国地，即今山东半岛一带；东南通向吴楚旧地，即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成为陆路交通的干线。据清代的顾祖輿说：他在湖南零陵县还看到“阔五丈余，类大河道”的秦驰道遗迹^①。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匈奴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的防御，公元前二一二年，命令将军蒙恬修一条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与通向咸阳的驰道相接，全长一千八百里的直道。这条路是从万山丛中直穿过去的，修时辟山填谷，异常艰苦。八十多年后，史学家司马迁还走过这条直道，他对其工程的艰巨十分赞叹。秦始皇还派常頔（音鄂è）在今四川宜宾市及庆符县以南开了一条山道，通向今云南省一带，叫做“五尺道”。此外，从关中入蜀的栈道也进行了修复。

秦始皇对水路交通的整修和开辟也很重视。下令决通了阻碍水道畅流的堤防，疏浚了鸿沟（今河南汴河），把它和济、汝、淮、泗等水连结起来，构成中原地区的水路交通网。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灵渠的开凿。灵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是秦

^① 《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十一

始皇为开发岭南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发大军五十万向岭南进军，由于山路崎岖，转运粮饷困难，秦始皇派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①。湘江发源于灵川县的海洋山，东北流入洞庭湖；漓江发源于兴安县西北的猫儿山，西南流入西江。两水上源在兴安县城到溶江镇一段地方相距约六十里。史禄就选择这段地方开凿了灵渠，把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灵渠的兴修作用极大，拿运粮来说，粮食在长江上船，经过湘江而通灵渠，再由灵渠而过漓江，由漓江而达流向广东的西江，粮食即可运到岭南地区。这样就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扩大了我国古代内河航行范围，促进了中原和两广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灵渠开凿以后，秦始皇调发许多中原人民进入岭南，“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②。中原人民大量经灵渠南下，移居岭南，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秦汉时代，内地的铁制工具和耕牛经由灵渠入岭南，南下的汉族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岭南的生产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灵渠的开凿，具

① 《淮南子·人间训》

② 《汉书·高帝纪》

有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治山治水经验的结晶，也是秦始皇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个见证。

秦始皇为了从政治上慑服六国残余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在统一后的十年中，先后五次到各地巡视。西面到过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北面到过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到过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附近），东面到过山东半岛边上的之罘（音扶fú）、成山、琅琊台，东南上过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南），南面登过九嶷山（今湖南蓝山西北）。往返不下数万里，车骑仪仗，浩浩荡荡，所走的道路当然都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干线。可见，当时在广阔的中国境内，已经建立起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这个交通网如同脉络一样，把各地区和首都咸阳联结起来，这对于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巩固国家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秦代形成的这一交通网，不但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干线，就在秦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也一直是我国境内的主要交通干线。

总之，秦始皇统一和改革文字、货币、度量衡和水陆交通道路，对于消除奴隶制时代遗留下的分裂因素，防止奴隶制复辟，强化地主阶级专政，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国家的统一，都起了积极

作用。

六、“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实行专政

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奴隶主贵族丧失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统治之后，必然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向新兴地主阶级伺机进攻，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就显得更加突出。因为，奴隶主思想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用革命暴力推翻了奴隶主政权，没收了他们的奴隶和土地，他们的反动思想还在。他们利用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力图达到腐蚀群众，征服人心，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目的。孔孟之道，就是奴隶主反攻倒算的思想武器；反动儒生，就是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言人。因此，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经济基础，就必须清除旧思想，发扬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革命。“焚书坑儒”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为了镇压反动儒生的复辟活动所采取的革命措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实行的革命专政。

秦始皇是法家思想的坚定的实践家，在清除吕不韦集团的斗争中，他把吕不韦招去的反动儒生全部赶出秦国。但是，统一六国以后，他对儒生不能再用驱逐出境的办法了，而采取了有控制的使用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①意思是，他想利用儒生之类人物的文化知识，来发展封建文化，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他在中央设置了博士官，授给儒生及其他学派中七十个头面人物博士的官衔，让他们管理国家的图书档案，给皇帝做古今史事的顾问，常邀请他们议论政治，还允许他们收徒弟讲学。博士中确实也有一部分愿意为封建政权服务的，但由于社会上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儒生作为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亦然站在奴隶主一边，对秦始皇的大兴大革总是一百个看不惯，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妄图推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复辟奴隶主专政。

公元前二一三年，已经是消灭六国后的第八个年头了。去年平定了百越，统一了两广地区，在那里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今年又打退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的侵扰，收复了河套南北，在那里设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置了九原郡。在当时人的地理观念看来，整个天下都统一了。秦始皇为了庆祝这个空前的胜利，在咸阳宫中大宴群臣。宴会间，博士长官周青臣颂扬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他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今天靠陛下英明，平定海内，统一天下，只要是太阳和月亮能照到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皇帝的命令的。把割据的诸侯变成统一的郡县，天下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再也不受分裂混战的祸患，这是传之万世的功业，自古以来那一个君王也比不上皇帝陛下的威德。”儒家博士淳于越对周青臣的话非常不满，立即跳出来进行反驳，说：“当年商、周的王位能传一千多年，原因就在于把土地分封给子弟功臣，叫他们共同辅助朝廷。今天陛下虽然统一了海内，自己的子弟却是匹夫，一旦臣属起来造反，有谁来救朝廷？办事不向古人学习而能长久的，从未听说过。如今周青臣又来当面阿谀奉承，使陛下继续犯错误，这种人不是忠臣。”显然，淳于越的文章做在秦始皇个人身上，挂着反对阿谀奉承的招牌，自命为“忠臣”，实际上是公然打出“师古”的旗号，反对郡县制度，对拥护封建制度的人进行恶意攻击，妄图恢复旧制度，复辟倒退。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在遭到灭顶之灾时，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新反扑。秦始皇听了，就把他的话交给群臣辩论。

淳于越的进攻，遭到法家代表丞相李斯的有力回击。李斯抓住要害，针对儒家的“师古”复旧的思潮说：“五帝的事业各不相同，并不是一个照样重复一个；三代的制度也不一样，并不是每一代都把前一代的制度再抄一遍。这不是他们偏偏要来一套新花样，时代不同了，统治方式就要跟着变。”他厉声责问淳于越：“你说的三代之事，今天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当年诸侯割据混战，儒生们到处招摇撞骗，充当说客。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统一，百姓应该努力农工生产，士就应该学习和宣传朝廷的法令，使大家都能遵守。你们这伙儒生却不学现在的法令，啥都是古代好，存心诽谤当今，迷惑人民！”李斯又当场揭露了儒生利用私学进行的种种阴谋活动，他说：“过去天下散乱，不能统一，诸侯互斗，儒生们颂古非今，说些漂亮的空话把实际搅乱，各学派都夸耀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国家所建立的法制。现在皇帝已经统一了天下，辨别是非有了统一的标准。儒生们仍然以他们的私学来攻击朝廷法令。他们一看见新的法令，就拿出古书来对照一下，说这不符合圣人之道，那不符合先王之礼，议论个没完。他们在朝廷里口是心非，出去就参与街谈巷议，用攻击皇帝来沽名钓誉，用反对朝廷的政令来抬高自己，率领一伙人造谣诽谤。这种

情况如不禁止，上会损害皇帝的权势，下会形成派别朋党。只有严禁才对。”为了严禁儒生们以古非今，李斯建议：除皇家图书馆藏书外，凡民间所藏的《秦记》以外的各国史书和儒家经典，一律送到郡县官吏那里烧掉；今后有敢于在一起议论诗、书的处死刑，是古非今的灭族；官吏如有包庇的与犯禁者同样处理；命令下达三十天不烧书的脸上刺字，罚作四年劳役；如要学习政策法令，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为了打退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猖狂反扑，坚定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儒家鼓吹复辟的大量的所谓“经典”，在全国各地化为灰烬。

“焚书”事件，在坚持反动立场的儒生看来，是一场浩天大劫，他们愈感到末日的来临就越是疯狂地挣扎。侯生、卢生是两个长期潜伏在秦始皇身边的反动儒生。他们原想通过神仙、方术来影响秦始皇改变原来的法家政治路线而改用儒家的政治路线，现在一看这条道路断绝了指望，就在焚书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二一二年，畏罪逃跑了。在追捕时发现侯生和卢生，与在咸阳城中的许多反动儒生互相串通，制造流言，惑乱百姓，恶毒攻击秦始皇实行的法家路线和政策。他们攻击地主阶级政权对复辟势力的打击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攻击中央集权制度是

“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咒骂秦始皇“贪于权势”，不重用他们的儒家博士等等。这种触目惊心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更加激怒了秦始皇。他派御史认真追查反动儒生的阴谋活动，经过儒生们相互揭发，查清了全部案情。秦始皇下令把其中罪行严重的四百六十个儒生在咸阳活埋处死。这就是“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并不是要毁灭文化，烧光书籍。

“焚书”令明确规定，农书和医书不烧，秦朝史书不烧，法家的书不烧，即使列入被烧的书，只要是藏在国家书库里的也不烧。他烧的主要是孔孟之徒注释、解说的诗书，也就是反动儒生用来以古非今，进行颠覆活动的儒家反动经典。东汉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就曾指出：在秦时儒家的五经确实遭到燔（音凡 fān）烧，以至到汉初搜求时仍然是“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可是，秦烧书时“不燔诸子”，汉初“诸子尺书文篇具在。”王充所说的事实，最近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出的西汉前期汉墓中的竹简进一步可以证实。在汉墓中发现了大量《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的竹简，还有《六韬》、《尉繚子》、《管子》、《墨子》、《晏氏春秋》的残简，唯独没有儒家经典的残简断片。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焚书”时，不烧儒家以外的

先秦诸子的著作。许多先秦诸子的古籍，倒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由于处在被“罢黜”的地位而逐渐散失的。这充分说明：古代优秀文化的真正破坏者，是儒家而不是法家，更不是秦始皇。秦始皇“坑儒”，也不是杀掉所有的儒生。对于赞成郡县制的周青臣及不搞阴谋活动的儒生不但不加迫害，还照样可以“优游论著”。“坑儒”事件之后，秦王朝内仍然有博士儒生，还选取博士，许多儒生一直活到汉代。秦始皇所坑杀的是那些鼓吹“克己复礼”，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的儒生，即一小撮“以古非今”的复辟派的死党。“焚书坑儒”集中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反动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两个方面：用进步的思想反对反动的思想；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活动。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好得很！如果不“焚书坑儒”，让孔孟之道任意泛滥，让反动儒生到处横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秦王朝就不可能得到巩固，统一国家就要分裂，腐朽的奴隶制就要复辟。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禁止儒生的“私学”活动的同时，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这是法家破旧立新精神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实践。“以法为教”，就是以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

意志的法律为教材，用法家的进步思想去教育人们，禁止以儒家的反动经典做教材。“以吏为师”，就是以革新派的法家做教师，夺取被儒家长期霸占的文化教育阵地，把教育由为奴隶主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变成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因此可说，这也是一场成功的地主阶级的教育革命。

“焚书坑儒”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儒法斗争反映了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搏斗，从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不能和平共处，不是儒家专法家的政，便是法家专儒家的政。儒家一贯采取“删书杀法”的奴隶主专政手段，对法家进行疯狂的迫害。孔丘就是最早“删书”、“杀法”的刽子手。他在鲁国执政三个月，就把法家的先驱少正卯捉来杀了，并且陈尸三天，以威吓革新派人士。他在編集古诗时，把三千多篇删得只剩下三百零五篇，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反映新思想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好诗被删掉了。法家邓析被砍头，吴起被射杀，商鞅被车裂，都是奴隶主贵族血淋淋的“杀法”的罪证。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专政。这些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法家，使他们认识到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对反动的儒家实行革命的专政。商鞅变法时即对儒家采取了坚决取缔的政策，荀子主

张“杀诗书”^①，韩非更主张对反动儒生要毫不留情地“破其群”，“散其党”，“灭其迹”^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他的发明，是新兴地主阶级在三百余年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斗争中总结的经验，是从奴隶主阶级那里学来的。他从儒家的“删书”中学到了“焚书”，从儒家的“杀法”中学到了“坑儒”，即学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从反革命的专政中学到了革命的专政。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后，新兴阶级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防止复辟，就应该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而且必须从意识形态领域里强化本阶级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革命专政，“焚书坑儒”正是强化这种专政的有力措施。

“焚书坑儒”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以法家战胜儒家而载入史册。秦始皇用革命暴力提倡法家“厚今薄古”的进步思想，反对儒家“是古非今”的反动思想，用“师今”代替“师古”，用“法后王”代替“法先王”，以法家思想为

① 《荀子·儒效》

② 《韩非子·诡使》

指导“别黑白而定一尊”，实行统一思想，他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厚”的是新兴地主阶级之“今”，“薄”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之“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是进步的。

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①。“焚书坑儒”就是对孔孟之道这种“神圣事物的亵渎”，因而遭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的恶毒咒骂。其中唐朝末年章碣写的《焚书坑》，是有代表性的。这首诗的原文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是一首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恶毒诽谤秦始皇的反动诗。

诗的前两句是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但没有使秦王朝得到巩固，反而使之虚弱了，秦始皇也死了。果真是秦始皇的一把焚书之火，烧虚了自己的帝业么？否！如前所述，秦王朝建立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秦始皇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博士儒生再也不敢

^①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肆无忌惮地“以古非今”，郡县制度得到顺利的推行，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中国的统一得到巩固，而决不是什么使秦王朝的“帝业虚”了。

诗的后两句企图说明，“焚书坑儒”引起了农民造反，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迅速垮台。果真是那四百六十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懂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儒生的亡灵唤来了覆灭秦朝的风暴吗？否！“焚书坑儒”同秦朝灭亡固然在时间上相距很近，然而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坚决打击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但是，秦始皇所建立的毕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机器，在当时一面有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的积极作用，一面又是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枷锁。秦帝国建立后，地主阶级获得新的解放所带来的也正是对农民阶级的新的压迫。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实行大规模的强制徭役和十分苛重的赋税，大修阿房宫和骊山墓，使大量劳动力长期和土地分离，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秦始皇死后，赵高代表奴隶主复辟势力发动反动政变，改变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路线，杀害法家，倒行逆施，发间左之戍，收秦半之税，“繁刑苦役”，“万人侧目”，

造成“黔首振恐”，从而迅速激化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终于爆发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前进，展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英雄气概和伟大力量。可见，秦王朝的覆灭并不是“焚书坑儒”导致的，而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秦王朝的失败，不是因为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太多了，而在于秦始皇对反动派的专政还不彻底，甚至让他们钻进了政权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这是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章碣站在反动儒生的立场上，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焚书坑儒”同陈胜、吴广起义和刘邦、项羽亡秦硬扯在一起，显然是妄图抬高儒家的身价，混淆历史是非，这暴露了他的尊孔骂秦的反动立场。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对“焚书坑儒”作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他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了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的。”鲁迅还列举出秦始皇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等大事业，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是对反动派诬蔑的有力批判。

第四章 正确评价秦始皇

秦始皇所处的战国晚期，是封建制最后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坚决执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法家政治路线，坚持破旧立新，反对复辟倒退，坚持厚今薄古，反对孔孟之道，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直接促进了当时社会以新代旧的历史转变，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历史告诉我们：新事物总是在同旧事物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当新兴地主阶级要铲除旧制度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要复辟旧制度的大决战关头，他执行法家坚持革新的政治路线，利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无情地镇压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清除了奴隶制度的旧基地，把新的封建制度推广到全国，从而使封建制度最终战胜了奴隶制度，使新兴地主阶级在这

个决战中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固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但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代替是进步的。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过渡到奴隶占有制时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①同样，在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时代，生产发展了，处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农民比起奴隶主阶级压迫下的奴隶来，不再被用作埋葬或祭祀奴隶主时的“人殉”、“人牺”了，其地位有所改善，也是一个进步。正因为这样，秦始皇用革命暴力扫除奴隶制残余，取得的一些成果，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秦始皇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功绩是：结束了分裂割据局面，创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新措施，为我国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

当时，我国以世界上最大最巩固的统一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里，我国的统一是长期的，分裂是短暂的。因为，统一有利于社会发展，符合各族人民利益，人民总是拥护的；反动势力闹分裂总是不得人心的，因而都很快垮台了。我国各族人民在反抗封建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兄弟情谊和共同的政治命运，携手缔造祖国的历史，这和国家的统一是分不开的。

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① 正因为秦始皇手里结束了诸侯混战状态，使我国在进入封建社会初期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保持国家的独立，从而促使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在以后有较高的发展。

今天，封建主义时代早已过去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正在

^①莫斯科八百周年的《贺词》

做前人从未做过的豪迈事业。国家的统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当然，“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是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任何时代的统一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绝不割断历史，而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

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不能脱离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所执行的路线。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①秦始皇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充分显示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前后的特征。他的成功绝不是由于他是什么“天才”、“超天才”，而是由于他所推行的封建制度较之奴隶制度是进步的；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和奴隶主贵族作斗争中，是生气勃勃的、革命的、先进的政治力量；他所执行的法家政治路线是更好的集中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当时是唯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横排本第1136页。

一正确的路线。他确实有卓越的才能，但他的智慧和力量都来自他所处的时代，所代表的阶级，所执行的路线。那些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的孔孟之徒，凭着他们的“天才”妄图倒行逆施，结果一批一批在秦始皇的打击下，变成了历史上的垃圾。

把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绝不能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对立起来。没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也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历史贡献。譬如：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用铁制造工具，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就不会引起井田制度的崩溃，也不会产生新兴地主阶级，当然更不会突然出现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秦始皇。如果没有春秋战国以来以奴隶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反抗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的阶级斗争，逐渐改变了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力量对比，改变了先进的秦国与落后的六国的力量对比，造成了秦始皇时代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有利时机，那嬴政就不会想到要统一中国。如果没有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没有秦国的“民利战”和六国的“民不用”^①，不论秦始皇有多高明的指挥才能，也不可能统一中国。如果没有广大奴隶争取解放的强烈要求，没有几

① 《汉书·晁错传》

百年封建改革的经验积累，秦始皇就不可能提出那些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改革措施，更不可能设想改革的成功。由此可见，不是秦始皇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更不是秦始皇驾驭“群氓”创造历史，而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依赖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社会条件，才做出了一番促进历史前进的事业。

当然，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个剥削阶级，秦始皇毕竟是个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和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是一样的。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地主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秦始皇在政治上的二重性。他在摧毁奴隶制度、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时是革命者，是真老虎，他在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时却走向反面。他在解决地主阶级、人民群众与奴隶主的矛盾，统一与分裂的矛盾时，显得很有力量；而对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抗的矛盾，他总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坚决压迫农民的。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也不可能彻底镇压反革命。特别严重的是，让奴隶主贵族代表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导致了一场反革命政变。总之，秦始皇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是以奴隶

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为前提的，但又是通过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实现的。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全面考察秦始皇的功过，应该说他的功绩是主要的，罪过是第二位的。

秦始皇生前叱咤风云，身后毁誉纷纷。两千多年来，在如何评价秦始皇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历史上的新兴阶级，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于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历代一切开倒车的反动派，无不尊孔反法，无不恶毒咒骂秦始皇，秦始皇简直被他们贬斥为千古罪人。

西汉初期，地主阶级还处在上升阶段。继续扫除奴隶制残余，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他们面临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从汉高祖开始的几个皇帝都是奉行法家政策。“汉承秦制”，西汉基本上采取了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汉初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一般都还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汉文帝时的法家贾谊，虽然在《过秦论》中对“焚书坑儒”作了错误的批评，但却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进步的，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当时不但“天下之士，斐然向风”，新兴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十分拥护，就是普

通老百姓也是欢迎的。汉景帝的“智囊”、著名法家晁错，认为秦始皇消灭六国的功绩，古代的三王也是比不上的^①。

汉武帝时期，地主阶级已经巩固了它的统治，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地主阶级中的保守派就意识到秦始皇的法家革新精神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有矛盾，而主张复古反对变革的孔孟之道，稍加改铸之后，就能为封建制度的“永世长存”作辩护，并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奴役。于是，反动思想家董仲舒就跳出来攻击秦始皇。他公然指责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② 在地主阶级里面，董仲舒是第一个公开打出尊孔反法黑旗的祖师爷。当时在位的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主要是为了搞欺骗。其实，汉武帝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法家，他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在内外政策上继续推行法家路线，任用的一些重要官吏如桑弘羊、主父偃、张汤等都是法家，秦始皇开创的封建统一事业，到汉武帝手里才最

① 《汉书·晁错传》

② 《汉书·董仲舒传》

后巩固起来。

汉武帝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注重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工商奴隶主，削弱了地方豪强进行叛乱的物质基础，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这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桑弘羊。汉武帝去世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掌权，妄图搞掉御史大夫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法家路线，在各地选派六十多个反动儒生，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挑起了一场儒法大论战。反动儒生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对桑弘羊进行围剿。他们认为秦始皇“蚕食诸侯，并吞战国以为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简直是大逆不道。攻击秦始皇的变法革新是“废古术、堕旧礼、专任刑法”。胡说什么“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大肆宣扬复古主义，妄图倒转历史车轮。桑弘羊舌战群儒，对反动儒生的攻击逐条给予有力驳斥。他指出：“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势居然也”。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造成的，是历史的必然，是进步的。他高度评价了秦国推行法家政治路线取得的成果，“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姦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他

特别热情地赞颂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丰功伟绩，认为对孔丘那一套反动思想及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孔孟之徒，“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桑弘羊的一番雄辩，驳得反动儒生狼狈不堪，他们才真正是“口张而不歛，舌举而不下，闇然如怀重负而见责。”^①这是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全面肯定秦始皇历史功绩的最后一次“绝唱”。

汉元帝时候，地主阶级就从一个革命的阶级向它的反面转化。伴随着这个转化的过程，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尊孔骂秦的调子越来越高，而称颂秦始皇的声音，则越来越少了。直到唐朝中叶柳宗元为了反对当时的藩镇割据，写出了《封建论》的雄文，高度地评价了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功绩，冲破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显示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宋以后，封建社会逐步发展到它的后期，地主阶级日益走向反动，日益腐朽没落，日益害怕进步力量，因而更加恶毒地攻击秦始皇和法家。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土豪劣绅，整个地主阶级都在咒骂秦始皇。

^①儒生和桑弘羊辩论见《盐铁论》

明代的反动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阳明，咬牙切齿的叫嚷他对“灭先王之道”的秦始皇存着“千古不平之恨”^①。他在攻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说，如果秦始皇不烧儒家经典，而是反过来，把反对儒家经典的书籍统统“取而焚之”，那就和孔子删书的目的一致了^②。真是绝妙的自供。他一语道破了孔孟之徒攻击“焚书坑儒”的反动实质。只许没落奴隶主阶级肆意删改古代典籍，不许新兴地主阶级烧掉儒家复古主义的经典，这完全是反动派的逻辑。然而，明清之际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要求进步和变革的新的社会因素。李贽、王船山等进步思想家以坚决的态度和明确的语言，对秦始皇作了高度的评价，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因素正在出现的一种反映。明末反对孔学的不屈斗士李贽，在反动派对秦始皇的一片骂声中，挺身而出，勇敢地为秦始皇“辨雪”。他推崇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他为秦始皇镇压反动儒生拍手叫好，说“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③。凶狠毒辣的反动派，最后终于

① 《王文成公全书》

② 《阳明集要·传习录》

③ 《藏书·秦始皇帝》

给李贽加上“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的罪名^①，重演了孔丘杀少正卯的丑剧，将七十六岁的李贽逮捕下狱，迫害致死。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继柳宗元之后，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的进步作用。他把郡县制与分封制作了比较，认为秦以后郡县制下的老百姓所蒙受的祸害，要比秦以前分封制时代轻。从整个天下的利和害来讲，郡县制比分封制利多害少。他斥责了那些咒骂秦始皇，同时又想使自己的子孙永远私有天下的人，这不表明他们是天下之大公，而是他们的虚伪^②。

到了近代，对秦始皇的两种对立评论壁垒更加分明。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刽子手曾国藩，就恶毒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秦灭书籍”^③。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派更是破口大骂秦始皇^④。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如孙中山等则给予秦始皇相当的肯定。青年革命家陈天华还赞扬秦始皇以“震天撼地”的气概破旧立

① 《明神宗万历实录》

② 《读通鉴论·秦始皇》

③ 《圣哲画像证》，《曾文正公文集》

④ 王龙文：《平养堂文编》卷一下《荆轲》

新，“犹悬河以泻火，犹倒东海以倾大地”，“自羲黄以来”，为历史“另开一大生面，为后世二千余年政界之新纪元。”他肯定“始皇有征匈奴、辟疆土之功”，在保卫北方、打击匈奴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的侵扰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①。

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赶走了皇帝，埋葬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后来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帝国主义走狗、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公开实行独裁统治，并且积极筹备复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了复辟君主制，反动势力大造反革命舆论，掀起一股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逆流。那个曾经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后来堕落为保皇派头子的康有为，成了这股复辟逆流的急先锋。康有为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味实行法治，不行孔老二的“仁”政，秦朝终于迅速灭亡了。这种“法家亡国”论，是直接为复辟势力攻击辛亥革命的“革命糟透”论服务的。目的就是攻击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违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攻击广大革命人民在辛亥革命中废除了拜孔的礼节，取消了读经的课程，是犯了历史上

^① 《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

秦始皇“焚书坑儒”那样的大罪恶。康有为开的“救国药方”，就是只有尊孔读经，克己复礼，复辟帝制^①。面对尊孔复辟的逆流，正在北京遭到袁世凯软禁的章太炎，陆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向复辟逆流猛烈开火。其中一九一四年发表的《秦献记》和《秦政记》，有力地驳斥了复辟派诬蔑秦始皇的种种谬论。章太炎在《秦献记》中热情赞颂了秦始皇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为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而采取“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指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如果不烧掉为奴隶制复辟造舆论的儒家经典，就不能尊崇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这是对复辟派鼓吹尊孔读经的严正批判。很明显，章太炎歌颂古代的“新王”秦始皇，就是为了尊重当时的“新王”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巩固在辛亥革命中新创建的共和政体。章太炎在《秦政记》中勇敢地为秦始皇实行法家政治路线申辩，称赞秦始皇时的政治，比他以前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搞得好。他实行法治，自己就第一个带头奉公守法，用人唯贤，赏罚严明，没有乱杀过一个官吏。后代一些有名的皇帝和他相比，那些人不过是深池，而秦始皇如同耸入云霄

^①见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等文。

的高山。崇尚法家，实行革新，不是秦亡的原因，而恰恰相反，是使秦始皇成为杰出人物的根本。这就狠狠回击了复辟势力“法家亡国”、“革命糟透”等谬论，捍卫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原则。很清楚，辛亥革命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和对法家以及秦始皇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章太炎旗帜鲜明，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表现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主张变革、反对复辟，歌颂进步、蔑视倒退的战斗精神，直接配合了正在高涨中的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替倒袁运动进行了舆论准备。

回顾历史上肯定或否定秦始皇的论争，从来是和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革命的阶级、先进的人们，为了实行革命或革新的路线，总是赞扬秦始皇，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反之，反动的阶级、复古保守分子，为了推行复辟、倒退的路线，总是攻击秦始皇，极力否定秦始皇的进步作用。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历代反动派的衣钵，一面祭起孔老二的亡灵，把反动的孔孟之道捧上了天；一面多次大肆咒骂秦始皇。林彪一伙攻击秦始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文化大

革命，妄图实现其“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纲领。

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等一系列斗争，对地、富、反、坏、右和一切阶级敌人实行了革命的专政，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引起了国内阶级敌人和国际上帝、修、反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他们恶毒攻击镇反运动是“秦始皇式的焚书坑儒”。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这个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刻骨仇恨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立即跳出来，同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唱反调，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林彪的恶毒攻击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唱的一个调子，是为两千多年前被秦始皇镇压的那些反动儒生鸣冤叫屈，为解放以来被我们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借此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的反动谬论当即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正驳斥。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对一小撮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专少数剥削者的政。就此而言，与秦始皇的地主阶级专政有着根本的、原则的区别。秦始皇是剥

削阶级专政，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私有制，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彻底消灭私有制。但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也必须用革命暴力镇压妄图复辟的反革命，这一点却与当年秦始皇时有着类似的地方。正如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他同任何专政一样，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①。但是，历史上的任何剥削阶级专政都不可能彻底镇压反革命，而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是群众性的专政，对反革命的打击就更有理、更有力、更彻底。敌人骂我们是“秦始皇”，说的不够，还需要我们来补充，在镇压反革命复辟方面，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林彪受到毛主席批判以后，怀恨在心。一九六〇年五月，林彪带着他的死党跑到山海关长城脚下的“孟姜女庙”去朝拜。这再次暴露了他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面目。这座孟姜女庙建于北宋时期，是根据当时人编造的“孟姜女哭长城”一事建成的，而“孟姜女哭长城”是由“杞梁

①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妻哭城”演变而来。据《左传》记载：在春秋初期齐庄公时，齐国勇士杞梁在攻莒（音举jǔ）战役中阵亡，其妻在城下大哭，“七日而城为之崩”。这件事远在秦始皇以前四百多年，与秦始皇修长城毫无关系。唐宋时期的尊孔派文人，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恶劣手法，把杞梁妻哭城逐步改编成孟姜女哭长城，硬给秦始皇身上栽赃。就是当时修庙的人也承认这是“讹传”、“野语”，谁也“难究”。但是，由于反动派尊儒反法的需要，多少世纪以来，孟姜女庙一直作为秦始皇实施“暴政”的罪证。从这里不难看出，林彪一伙朝拜孟姜女是假，借以咒骂秦始皇，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是真。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全面进攻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它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荡涤着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地冲击着反动的孔孟之道。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咒骂秦始皇“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他们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公然号召大家都当董仲舒，“高举”“孔孟之道”。他们

再次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反对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剥削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们号召“大家都当董仲舒”，就是号召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从意识形态领域里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就是妄想接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黑旗，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罢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独尊”孔孟之道，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精神武器，愚弄人民，破坏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

一九六八年，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领了林彪的“圣旨”窜到河北易县荆轲山，向那个谋刺未遂而被秦始皇剁成肉泥的亡命之徒荆轲表示凭吊，吹捧荆轲，怀念燕太子丹，攻击秦始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重要时刻，林彪一伙突然对一具两千多年前的僵尸发生兴趣，是包藏着阴险祸心的。这暴露了他们对以燕太子丹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为了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而采取孤注一掷的暗杀手段十分欣赏，早就蓄意制造阴谋暗杀事件。这暴露了他们对为了复辟倒退而不惜丢掉脑袋，甘心情愿为主子卖命的荆轲那种走狗非常喜爱，早就

图谋收罗一批荆轲式的打手，来挽救他们行将灭亡的命运。他们和燕太子丹血缘虽远但反动本性一致，是一副贼心肝，是一伙依靠阴谋诡计过日子的反动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胜利。事实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林彪却如兔死狐悲，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把秦国复辟派咒骂商鞅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写成条幅，挂在床头。在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书写了这个条幅。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咒骂，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

一九七〇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阴谋后，林彪死党竟公然哼诵章碣那首歪曲历史、攻击秦始皇的反动诗《焚书坑》，借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利用这首反动诗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别有用心的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比作被推翻的封建王朝，把历次政治运动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对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的批判诬蔑为“焚书坑儒”，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随后，林彪为了进行垂死挣扎，暗地里秘密策划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他更加丧心病狂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是“专制独裁”，叫嚷对那些所谓“受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很清楚，他就是妄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地、富、反、坏、右翻案，为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让牛鬼蛇神一齐上台，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历史上的反动派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妄图阻挡社会前进，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和他们一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林彪一伙攻击秦始皇的言论很多，但集中起来，则是咒骂秦始皇“残暴”，是什么“暴君”，没有实行儒家的“仁政”、“德治”。列宁教导我们：“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

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① 林彪就是一个打着反对一般暴力的幌子，反对革命暴力的市侩。马克思主义者从不笼统地反对暴力和专政，而是主张对暴力和专政进行具体地阶级分析。凡是镇压反动阶级的复辟和反抗，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都是革命的暴力，革命的专政，应该肯定；反之，则是反革命的，应当坚决反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实行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法治”等，都是扫除奴隶制的污泥浊水的革命暴力，是应该肯定的。只有那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才反对这种革命暴力。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孟轲，是最早攻击法家是“暴君”的。当战国中期，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正在取代奴隶主专政之际，孟轲诬蔑这种情况是“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咒骂“废井田”的秦孝公、商鞅是“暴君、污吏”，他认为破坏井田制度是“暴政”，恢复井田制度才是“仁政”^②。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六国奴隶主贵族都攻击秦是“暴秦”，“虎狼之国”。当时的反动儒生攻击秦始皇“行桀纣之道”等等。他们都是反对新兴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② 《孟子·滕文公篇》

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妄图复辟更野蛮、更残暴的奴隶主专政。林彪向两千多年前的奴隶主鸚鵡学舌，把镇压奴隶起义的刽子手美化为“仁君”，说他们实行的“君子长者之道”，却把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秦始皇叫“暴君”。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其罪恶目的就是反对革命暴力，借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大叫“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咬牙切齿地要对革命人民采取“特种手段”进行“严厉镇压”。可见林彪只是反对革命暴力，却要的是反革命的暴力；只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却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血淋淋的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敌人的咒骂，恰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是极端重要的。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不对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敌人就会反过来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林彪是一个反面教员。他攻击法家是“罚家”，咒骂法家思想杰出的实践家秦始皇，反对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革命暴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如何正确认识法家及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决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术问题，而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坚持进步还是坚持

倒退的问题，在今天，也就是要不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法家的反孔斗争史，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附：秦历史年表

公元前659年——前206年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年 始 皇 龄	大 事
前659— 前621	秦穆公 共三十九年		秦穆公攻戎王，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穆公死，杀一百七十人殉葬。
前620— 前609	秦康公 共十二年		
前608— 前604	秦共公 共五年		
前603— 前577	秦桓公 共二十七年		
前576— 前537	秦景公 共四十年		
前536— 前501	秦哀公 共三十六年		
前500— 前491	秦惠公 共十年		
前490— 前477	秦悼公 共十四年		
前476— 前443	秦厉共公 共三十四年		秦初县频阳。
前442— 前429	秦躁公 共十四年		义渠攻秦，侵至咸阳。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 年 龄	大 事
前428— 前425	秦 怀 公 共 四 年		秦庶长毳杀怀公。
前424— 前415	秦 灵 公 共 十 年		
前414— 前400	秦 简 公 共 十 五 年		“初令吏带剑”。四〇八年实行“初租禾”。
前399— 前387	秦 惠 公 共 十 三 年		蜀攻秦，取南郑。魏攻秦，败秦于武下。
前386	秦 出 子 元 年		
前385	二 年		秦庶长茵改迎公子连回国夺权，杀出子，公子连即位，即秦献公。
前384	秦 献 公 元 年		秦宣布废止殉葬。
前379	六 年		秦把蒲、蓝田、善明氏改建为县。
前378	七 年		秦“初行为市”。
前375	十 年		秦“为户籍相伍”。
前362	二十三年		秦献公死，秦孝公即位。
前361	秦 孝 公 元 年		秦孝公下令征求人材，卫国人公孙鞅入秦。公孙鞅即商鞅。
前359	三 年		秦孝公用商鞅为左庶长，下变法令，有奖励军功，奖励耕织等措施。（从《史记·商君列传》）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 年 龄	大 事
前354	八 年		秦与魏战于元里，消灭魏军七千，攻占魏的少梁。
前352	十 年		秦进围魏的安邑，安邑降秦。
前350	十二年		商鞅再下变法令，有废井田、设大县等措施。秦从雍迁都咸阳。
前340	二十二年		商鞅用计俘魏公子卬，大破魏军，封商君。商鞅率秦军攻楚。
前338	二十四年		秦孝公死，秦惠文王即位，商鞅遭旧贵族报复，车裂而死。
前331	秦惠文王 七 年		秦与魏战，消灭魏军八万。
前330	八 年		魏献河西地给秦。
前328	十 年		魏献上郡给秦。 秦以张仪为相。
前318	秦惠文王后元 七 年		楚、魏、赵、韩、燕五国合纵攻秦，推楚为“纵长”，攻到函谷关不胜而回。
前317	八 年		秦败魏、赵、韩军于修鱼，斩首八万二千。
前316	九 年		秦派司马错伐蜀，蜀亡。
前314	十一年		秦攻义渠，得二十五城。 秦败韩于岸门，灭韩军万人。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 年 龄	大 事
前312	十三年		秦在丹阳大败楚军，灭楚军八万，得汉中，置汉中郡。又在蓝田败楚军。
前307	秦 武 王 四 年		秦攻取韩的宜阳，灭韩军六万，攻占武遂。秦武王死，昭王即位，年少，宣太后听政。
前306	秦 昭 王 元 年		秦将武遂还韩。
前304	三 年		秦将上庸还楚。
前302	五 年		秦将蒲坂还魏。
前301	六 年		秦、韩、魏、齐，“连横”攻楚，在重丘败楚军，灭楚军二万。楚爆发庄跻起义。
前300	七 年		秦攻楚，灭楚军三万。秦以魏冉为相。
前299	八 年		楚怀王入秦，被秦扣留。
前298	九 年		秦军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前296	十一年		齐约韩、魏“合纵”攻秦，相持三年，攻入函谷关，秦割让三城求和。
前293	十四年		秦将白起在伊阙大败韩、魏军，斩首二十四万。
前291	十六年		魏冉再任秦相，秦以穰和陶给魏冉作封地，号穰侯。秦占韩的宛。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 年 龄	大 事
前290	十七年		韩魏向秦求和，魏割河东四百里给秦，韩割武遂地二百里给秦。
前289	十八年		秦攻取魏大小城六十一个。
前288	十九年		秦约齐一起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齐用苏秦计，自动取消帝号，“合纵”抗秦，秦归还一部分赵魏旧地。
前284	二十三年		秦与韩、魏、燕、赵五国攻齐，在济水以西大败齐军。
前283	二十四年		秦攻魏，兵临大梁，韩赵救魏，秦军退去。
前280	二十七年		白起率秦军攻赵，灭赵军二万。秦攻楚黔中，楚献汉北及上庸地给秦。
前279	二十八年		白起率秦军大举攻楚，攻占鄢、邓、西陵。
前278	二十九年		白起攻下楚国郢都，以其地置南郡。
前277	三十年		秦封白起为武安君。秦攻取楚的巫郡、黔中郡。
前275	三十二年		秦攻魏大梁，韩派暴鸢往救，被秦打败，斩韩魏军四万。魏割温给秦。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 年 龄	大 事
前274	三十三年		秦攻取魏四城。
前273	三十四年		赵魏联军攻韩华阳，秦派白起救韩，破赵魏军，斩首十五万。
前272	三十五年		范雎入秦。
前271	三十六年		魏冉派秦军取齐刚寿。范雎进见秦昭王，献远交近攻策。秦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
前270	三十七年		秦将义渠王骗到甘泉杀死，灭义渠，建立北地郡，并筑长城。
前266	四十一年		秦昭王夺宣太后权，免魏冉相，起用范雎为相。
前264	四十三年		秦派白起攻韩，占领九城，斩首五万。
前261	四十六年		赵派廉颇在长平抗击秦军。
前260	四十七年		赵用赵括代廉颇为将，白起率秦军在长平大破赵军，活埋战俘四十五万。
前259	四十八年	一岁	一月，嬴政在邯郸生。秦攻取赵的武安、皮牢、太原。
前257	五十年	三岁	秦杀白起。魏楚救赵，在邯郸城下打败秦军。秦公子异人自赵回秦。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年 龄	大事
前256	五十一年	四岁	秦攻韩，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斩首和俘虏九万。秦灭西周。周赧王死，从此周亡。
前251	五十六年	九岁	范雎称病请交相印，秦拜蔡泽为相。秦昭王死，秦孝文王继承王位。
前250	秦孝文王 元年	十岁	秦孝文王死，异人（又名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
前249	秦庄襄王 元年	十一岁	秦灭东周，攻取韩的成皋、荥阳，建三川郡。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
前248	二年	十二岁	秦攻占赵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
前247	三年	十三岁	秦攻魏，魏信陵君合五国兵击秦，败秦军。秦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
前246	秦始皇 元年	十四岁	秦平定晋阳，重建太原郡，后将太原改为嫪毐的封国。秦开始修郑国渠。
前245	二年	十五岁	秦攻取魏的卷，斩魏军三万。
前244	三年	十六岁	秦攻取韩十三城。
前242	五年	十八岁	秦攻取韩的酸枣等二十城，建立东郡。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年 龄	大事
前241	六年	十九岁	楚、赵、魏、韩、卫五国“合纵”攻秦，楚为纵长，至函谷关为秦所败。
前239	八年	二十一岁	秦王弟长安君成蟜率军至赵叛，秦击溃叛军。吕不韦发表《吕氏春秋》。
前238	九年	二十二岁	秦王政举行冠礼，开始亲自主持政事。嫪毐叛乱，秦王政杀嫪毐，灭其三族。
前237	十年	二十三岁	吕不韦被免相。
前236	十一年	二十四岁	赵攻燕，秦派王翦等以救燕为名，攻取了赵国的九个城。
前235	十二年	二十五岁	吕不韦自杀。秦助魏攻楚。
前234	十三年	二十六岁	秦攻赵的平阳，灭赵军十万。
前232	十五年	二十八岁	秦攻赵，一军攻到邺，一军由太原攻到番吾，被赵将李牧打败。
前231	十六年	二十九岁	韩献一部分残存的南阳地给秦。
前230	十七年	三十岁	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韩王安，韩亡，以其地建颍川郡。
前229	十八年	三十一岁	秦大举攻赵，派王翦率兵直下井陘关，派杨端和围攻邯郸。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 年 龄	大 事
前228	十九年	三十二岁	秦大破赵军，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称代王。
前227	二十年	三十三岁	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不中，秦杀荆轲。秦派王翦、辛胜攻燕，在易水西大败燕军。
前226	二十一年	三十四岁	秦攻下燕都蓟，燕王喜迁辽东。秦派李信率军二十万攻楚。
前225	二十二年	三十五岁	秦派王贲攻魏，决河水灌大梁，魏王假投降，魏亡。楚打败秦军，李信逃回秦国。
前224	二十三年	三十六岁	秦派王翦率兵六十万攻楚，占领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
前223	二十四年	三十七岁	王翦率秦军渡过长江，平定楚江南地，楚亡。
前222	二十五年	三十八岁	秦派王贲攻燕的辽东，俘虏燕王喜；又攻代，俘虏代王嘉。
前221	二十六年	三十九岁	秦派王贲灭齐，俘虏齐王建，从此统一全国。秦王政改称皇帝，废除分封制度，普遍设立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强迫“豪富”十二万户迁咸阳。修阿房宫。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年 龄	大事
前220	二十七年	四十岁	开始在全国修驰道。秦始皇出巡西北。
前219	二十八年	四十一岁	始皇第二次出巡，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把三万户迁到琅邪台下，免十二年徭役。
前218	二十九年	四十二岁	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始皇第三次出巡。
前216	三十一年	四十四岁	“令黔首自实田”。
前215	三十二年	四十五岁	始皇第四次出巡，东北到碣石。
前214	三十三年	四十六岁	平定百越，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修灵渠。
前213	三十四年	四十七岁	击退匈奴，设九原郡，扩建长城。连续把商人和罪犯一起发配到百越地区。下令焚书。
前212	三十五年	四十八岁	修北起九原郡南至云阳的直道。移民三万家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免去其十年徭役。下令活埋方士、儒生四百六十余人。
前211	三十六年	四十九岁	迁三万家于北河、榆中，赐爵一级。
前210	三十七年	五十岁	始皇第五次出巡，在返回途中，七月死于沙丘，九月葬于骊山。赵高等立胡亥为二世。

公元	秦纪年	秦始皇 年 龄	大 事
前209	秦二世皇帝 元 年		赵高杀秦公子十二人，公主十人。继续修阿房宫。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
前208	二 年		农民起义军遭到挫折，陈胜被叛徒所杀。赵高杀李斯，灭三族。
前207	三 年		项羽在巨鹿消灭秦军主力。刘邦入武关，在蓝田打败秦军。赵高杀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
前206			十月，刘邦进军坝上，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灭亡。

《知识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这套丛书是为适应广大农村知识青年的自学需要而编辑的。其他战线上的知识青年也可以阅读。

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炼红心，学本领，献青春，显身手，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青年最肯学习。他们需要学习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学习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知识青年的学习需要着想，这套丛书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内容包括政治读物、文化读物、科学技术读物和文学艺术读物，帮助广大农村知识青年通过认真看书学习，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健康地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套丛书在编写上要求做到：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适合于广大农村知识青年阅读。

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不断改进。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七月



知识青年自学丛书

秦始皇评传

陕西师范大学写作组

何清谷 执笔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11094·11 定价：0.27元